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三起三落旗不倒

第二册

 **eBOOK**  
网络资料 电子图书

### 三起三落旗不倒

从 1927 年到 1932 年，王维舟一直在家乡川东领导革命斗争，先后三起三落，经历了相当的曲折，创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一时处于低潮。1927 年 8 月党派王维舟回川东老家，团结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撤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川东特委军事委员会，王维舟担任军委书记（即军事部长）。他注重在进步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加强对农会的领导，并从农会中挑选勇敢而有觉悟的青壮年建立武装小组，进行军事训练。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党在万源、宣汉一带建立了农会，成立了地方武装，打下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川东特区党委决定在万源、宣汉地区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因为万源、宣汉地处大巴山南麓，为军阀刘存厚的防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广大劳苦群众深受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而且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曾在这一带活动过，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决定首先在这里起义。

1929 年 4 月 27 日夜晚，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来自固军坝、炸井坝、白羊庙的赤卫队员及来自宣汉、官渡、开江、梁山等地的农会会员，云集在固军坝龙潭河，宣布川东游击军的第一支队成立，从此，竖起了川东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游击军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有力地震撼了敌人。四川军阀刘存厚手忙脚乱，急令第三路军代司令廖雨辰带了一个师，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游击军采取避敌优势，乘敌不备，攻其虚弱的游击战术，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游击军乘胜将革命浪潮推广开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至 1930 年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 5 个区 20 多个场镇，共 15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当革命在川东蓬勃展开和发展之际，军阀刘存厚部与刘湘部联合万余兵力，对游击根据地实行“清剿”，并成立“清共团”，采取“并村”、“连坐法”等手段，一路大肆烧杀，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接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于 6 月命令川东游击军东进，包围武汉。游击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远征。队伍行进到鄂西的竹溪、房县一带时，受到敌重兵包围，游击军奋力冲杀，给敌以重创，但终因寡不敌众，于 7 月败于东进途中。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7 月 29 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 3000 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

游击队成立后，由于当时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又一次命令这支新组建的农民武装东进湖北，去实现“会师武汉”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盲目计划。在讨论东征问题的会议上，王维舟发言说：“我们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现在游击队刚成立，都是新武装起来的农民，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政治动员，领导上也缺少思想准备，冒险远征作战恐怕是不行的。”他的意见未被引起重视，省委代表坚持东征，

并一再强调：“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必须服从。”

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

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又在石堡寨横渡长江。8月中旬，经楠木垭至西罗坪。连日长途行军，部队疲劳，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可是就在这时，敌刘湘部陈兰亭师和地方民团把游击队团团围住。部队在疲惫劳累中仓促应战，激战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部队被打散。王维舟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之后又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两次失败，仍然动摇不了王维舟的意志。1931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4月，王维舟由王波陪同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委会议，省委决定重新组建川东游击队，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发动第三次起义。会议结束后，王波留在成都工作，王维舟只身返回川东。

正当军阀刘湘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他的时候，王维舟带着党的重托回到了宣汉。回来后，他首先整顿组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一）加强党的领导，普遍建立健全县委、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不断扩充新的革命力量。（二）加强对游击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思想工作，使游击队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基干游击队，实行破仓分粮，打富济贫，领导农民抗租、抗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四）在军事斗争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游击战争，运用“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速战速决，打了就走”的巧妙方法去打击、消灭敌人。（五）对各地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正确的统战政策，扩大游击军的政治影响。（六）派一批革命者打入敌部，或从敌政权中拉出一部分人员，借以控制敌伪政府和武器，为我服务。同时会议决定，设立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于宣汉县芭蕉场大山坪，将现有的500多人编成3个支队。各支队成立后，采取稳步谨慎的斗争策略，分头开进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川东数县，开展分散隐蔽的活动。就这样，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第三次在这一地区竖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游击军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在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党和王维舟的正确领导下，川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此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在宣布大会上，王维舟讲了话。他不无激动地说：我们川东人民和游击军，在黑暗的岁月里，经过长期与敌人斗争，终于用鲜血换来了胜利！今天，我们劳苦群众站起来了，再不受那些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和欺侮了。接着，他又肯定地说：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是川东人民的光荣。这是一支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大家要踊跃参军，消灭敌人，保卫赤区，保卫革命政权，才能保卫子子孙孙的幸

福。

## 智摆空城计

南昌起义后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他在流沙会议上表示要重整旗鼓。1928年1月，贺龙肩负着党的重托，同周逸群等化装乘船离开了上海，开始了新的更加艰苦曲折的伟大征程。

回到湘西以后，贺龙创建红军经历了三次严重的挫折，但是他十分顽强。党的“六大”精神传达后，他深受启发，便总结前一段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思想和斗争策略，率部挺进敌人兵力空虚的鄂西地区，智取汪家营，奔袭建始城，收编“神兵”，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在部队建设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闹得热火朝天，声势越来越大。

第二年春天，贺龙乘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敌军调防之机，率部长途奔袭，攻占鹤峰城。宣布“耕田农有”，没收豪绅财产，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不久，蒋介石饬令湘鄂边各路敌军分五路围攻湘鄂边，湘西军阀陈渠珍一面聚集兵力向桑植县周围各县联合“围剿”；一面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向子云团派去“讨伐”，并贴出了“杀死贺龙者赏光洋5000元”的告示。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贺龙针对向子云刚愎自用、骄傲轻敌的弱点，决定利用桑植县城一面靠水、三面环山的险要地势，给他摆一个“空城计”。当向子云率部气势汹汹地扑来时，贺龙主动将部队撤出桑植县城，故意向敌示弱，再以小部队同敌保持接触；将其诱进桑植县城。然后，断敌退路，出伏兵“关门打狗”。果然，向子云扑到桑植县城以后，未遇大的抵抗，以为红军已被吓跑，便大摇大摆地向城内开进。向子云以为大功告成，竟不可一世地向上司报捷道：“桑植一带（共匪）已基本肃清，不日即可凯旋归去。”

正在他自鸣得意之时，城外突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直奔县城杀来。一时间城里城外，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一处，震耳欲聋。立足未稳的敌兵被红军这突如其来的猛烈冲杀搞得昏头转向，顷刻间已死伤大半。向子云一见此状，才知中计，仓皇带着残兵冲出南门，企图抢渡赤溪河逃命。可当他刚到赤溪河边，便遭到另一支早就预伏好的红军的迎头痛击。原来这是贺龙早就预料到的，事先已让红军一部设伏于此。向子云看到大势已去，便跳入河中想泅水逃命，但很快就被巨浪吞噬了。

贺龙智摆“空城计”，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巩固和扩大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当地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贺龙将军献空城，喜煞永顺向子云；  
自投罗网逃不脱，全军覆没快人心。

## 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1930年3月16日，初春的太阳，悄悄地升上鸡公山的顶峰，缠绕在山间的团团晨雾渐渐散去。丹崖绿壑中芷草迎风抖动着毛茸茸的嫩茎，山脚下一畦畦油菜开着鹅黄色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清香，竹竿河扭动着纤细的身躯，清澈的流水放声歌唱。

突然，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一个阴影掠过山顶，摇摇晃晃在山谷中盘旋，并径直朝河滩扑来。“嘭”地一声，它在河滩上滑出百十来米，“嘎吱”一声停住了。它像一个庞然的怪物，一边伸出两个大翅膀，屁股上尾巴翘起，尾巴上画着国民党的党徽。

这里是湖北大悟县宣化店的陈家河，属于“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地。“当、当、当”，震耳的钟声骤然响起。

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手执锄头、长矛、大刀、鸟枪，高声喊叫着从四周潮水般地向“怪物”涌来。他们是赤卫队队员。

一群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和礼帽，手拿“汉阳造”的人，也嗷嗷喊叫着向“怪物”扑来。他们是国民党的民团。

“呼呼”，“咻咻”，双方互不相让，在河滩上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民团势单力孤渐渐抵挡不住，咒骂着扔下几具尸体溃退了。赤卫队员迅速把停在河滩上的“怪物”包围了起来。“怪物”脑袋上突然打开一扇门，一个头戴皮帽，眼睛上罩着一对大风镜的人，举着双手走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喊着：“我是飞行员，请各位父老兄弟不要伤害我。”

“飞行员？”人们迷惑不解地互相交头接耳，询问着，猜想着。

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空中怪物”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部队和陈家河苏维埃政府，不但要保护好“空中怪物”和飞行员，而且立即将“空中怪物”运送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于是，当地的赤卫队和红军将“空中怪物”大卸六块，用马车拉、用驴驮、用人扛，翻山越岭，兴师动众忙碌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才将“空中怪物”运抵新集。

偏僻、孤寂的新集沸腾了，人们纷纷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山村里赶来，围着这个庞大的怪物发表着古朴偏执，想象力丰富的议论：

“听说它不吃草不吃料，也不吃馍，专喝一种带有怪味的白水，喝了它才能展翅飞上蓝天。”

“听说它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在天上飞的时候，地上的什么物件都看得见，连谁家婆娘坐月子，生男生女都看得一清二楚。”

“听说它还会翻跟斗，会下蛋呢……”

鄂豫皖红军负责人徐向前得知“空中怪物”运到新集后，心中一阵狂喜，特地跑到“怪物”前端详了许久，又围着它转了两圈，然后伫立在翅膀前笑了。他突然产生一个要“怪物”为红军所用的想法。他立即派人找来了被俘的飞行员。

飞行员来了，当他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时，心猛然颤抖起来。“完了，这一定是最后的审讯，共产共妻的红军，是不会给我留下一个完整的尸首的。”他喃喃自语走进了屋内。但令他吃惊的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小红军不但让他坐下，还给他端来一碗热茶。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你叫什么名字？”过了一会，一个和气的声音问道。“龙文光。”他低着头回答。

“在哪个部队供职？”

“航空署驻汉口第四侦察机队。”

“怎么飞到苏区来了？”仍是那个和气的声音。

“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通讯任务返航时，汽油耗尽了，只好迫降……”

他小心翼翼地回答着对方的问话，并悄悄抬头望一眼操着山西口音的问话人。这个人30来岁，瘦高的个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清癯的面孔上闪烁着—双笑眯眯的眼睛。

当他得知眼前这位首长就是徐向前时，感到十分惊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要他的首级的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原来竟是如此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他不敢相信眼前这难以否认的事实。

徐向前让龙文光继续当飞行员，为红军服务。龙文光答应考虑考虑。

—天、两天……他失眠了，两个阶级、两种信仰在头脑里反复斗争着。最终他选择了红军。

他找来了帮手，把拆开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了—层银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那枚国民党的党徽不见了，代替它的是机翼下用红漆精心描绘的两颗醒目的五角星。龙文光被俘后投向了光明，成为—个值得自豪的红军战士。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还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不久，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局长由飞行员龙文光兼任。航空局设在新集北侧的普济寺院内，并在院外修建了占地百余亩的飞机场。为了便于飞机起落，又在黄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和皖西的金家寨，同时修建了两座飞机场。

修好了飞机场，但到哪里去弄汽油呢。当时苏区被敌人封锁包围，连点灯的煤油都要用菜籽油代替，何况价格昂贵的汽油呢！正巧，国民党第34师师长岳维峻在双桥镇战斗中被红军俘虏，他的女婿是个大商人，并时常来苏区探望他的岳父。红军抓住这个机会，敲这位商人的“竹杠”。结果，这位大商人先后从武汉为红军买来3000多公斤汽油。

“列宁号”飞起来了。第一次飞行是到敌占区的固始、潢川、光山等地进行军事侦察与空投传单。随后，又远航汉口。这一举动，使武汉三镇的国民党政府惶恐不安，对军事要地实行灯火管制。就连武汉政府办的《扫荡报》也惊呼：“列宁号飞机，近日连续强抗潢川、汉口等地，现有关军方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这是—个雪后的早晨，龙文光手拿飞行图快步走到机场，将驾驶着“列宁号”去执行—项战斗任务。当他瞥见机翼下挂着两枚120磅的炸弹时，嘴角露着—丝快慰的微笑。

银装素裹的山岭，炊烟袅袅的村庄，从机翼下掠过时，它们显得那么渺小，消逝得又是那样迅速。龙文光手握操纵杆，倾身凝眸远眺着，搜寻着，—个灰蒙蒙的图案在山谷中显现出来。他为之一振，脱口而出“黄安到了”。他立即降低高度，向黄安城上空扑去。

围着城墙有—条弯曲的黄线，他判断那是堑壕。仔细观察，看到堑壕中跃出无数穿黄军装的人，他们举着枪，摇晃着衣物、帽子，向“列宁号”跑着，喊着。黄安城已被红军围困—个月了，守城的国民党军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看见飞机来了，以为是武汉方面给他们空投食品来了。龙文光笑了，笑得很开心，连眉毛眼睛都靠在一块了。他—次降低了高度，几乎是在房脊树梢上飞，意在寻找最理想的轰炸目标。突然，—所院子房脊上的无线电台天线映入了他的眼帘，那儿准是敌人的指挥部。“列宁号”在空中迅速划出—个大弧线，对着那所院子俯冲过去，机身微微抖动了—下，两枚炸弹不偏不倚飘然坠下。龙文光向弹着点瞥了—眼，只见两个桔黄色的亮点—闪，两股浓烟腾空而起，接着霹雳般的爆炸声震动着耳鼓。

架有天线的房屋倒塌了，在雪地上眼巴巴地盼望食品从天而降的国民党士兵们有的被炸死，有的被冲击波撞得东倒西歪，哭爹喊娘。他们跑着，喊着，“共军的飞机，把咱们的指挥部给炸飞了！”好像无头的苍蝇，东飞西撞，乱作一团。

黄安战役胜利结束，歼敌 1.5 万余人，活捉敌第 69 师师长赵冠英。

1932 年 6 月，蒋介石集中 30 余万人，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为前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这次“围剿”不堪一击，不仅不作反“围剿”准备，反而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使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被迫放弃苏区，于 10 月开始战略转移。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频繁转战，不得不将“列宁号”飞机大拆大卸，人拉肩扛地带着它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最后，它成了部队的沉重包袱，只好把它埋到大别山区一个偏僻的山坳中。

第一任红军飞行员兼航空局长龙文光在赴武汉途中，被敌人杀害。

“列宁号”消失了，红军航空局解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的航空梦，打上了一个醒目的句号。

1951 年 9 月，王树声大将率慰问团到阔别 20 余年的大别山慰问老区人民时，大别山区的农民又把“列宁号”从山坳里挖了出来。当“列宁号”那锈蚀的残体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满含深情地摘下帽子，默默地低下了头。

## 一块界石

1930 年春，时任红 7 军军长的张云逸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为了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签发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提出了：“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张云逸还和邓小平一起亲自登门串户走访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很快，土地革命在凤山、东兰、凌云、奉议、百色、恩隆、思林、果德等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景象。广大翻身农民个个喜气洋洋，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右江两岸，到处唱起了歌颂共产党、歌颂红军的歌曲。

一天，军长张云逸带着十几名战士到部队检查工作。当他们顶着烈日到达途中的右江天险独石滩北面的三社泉时，路旁的水边有几棵枝叶茂盛的大榕树。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于是，张云逸就招呼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会。

张云逸找了块石头坐下之后，战士们也各自找个平坦的石块坐了下来，可是由于石块太少，有几个战士只好站在那里，张云逸见此状，朝周围环顾了一下，就站起来笑着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三岔路口，上有绿树挡荫，下有凉泉水，是过路人休息的好地方。可惜这里的石块太少了，来，我们再去多抬一点石块回来，让大家到这里来乘凉都有坐的，前人抬石后人坐嘛！”战士们一听，都积极响应军长的号召，当即跑到附近的山脚下去寻找石块了。

在一块玉米地里，张云逸和一个战士发现了一块又厚又平的长方形石块，十分满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块石头抬回来，又把上面的泥土冲洗干净，正要坐下试试的时候，突然，张云逸发现了什么秘密，马上让那位战士同他一起把石块放回原处，这个决定立时把战士给搞愣了：怎么，好不容易抬过来，现在又要往回抬，这是为什么？问军长，他也不马上说明理由，

只是说：“来，马上抬回去，必须放到原处，等一会我再慢慢给你讲其中的道理。”就这样，他们又气喘嘘嘘地把石块放回了原处。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张云逸，指着石板对那位战士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字”，战士听说石块上有字，马上凑了过来，仔细一看上面果然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界”字。

“这是老乡们的地界碑石，我们把它抬走，他们还得把它抬回来，弄不好，他们之间还会发生误会，引起纠纷，就会给人家增添麻烦，你说，我们该不该把这块石头抬回来？”到这时，张云逸才认真地给战士讲明了为什么把石块抬回去的理由。

“首长，你真细心！一个模糊的‘界’字也被您发现了。”战士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讲道。接过话茬，张云逸又语重心长地说：“这‘界’字虽然模糊了，但我们心中‘人民’二字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呀！”

### 聂荣臻在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简称。它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任务是派人打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搜集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和隐蔽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肃清内部敌人，镇压叛徒特务。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上海，素称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势力雄厚，黑社会组织猖獗，国民党特务和坐探如麻。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严刑拷打和金钱美色引诱共产党内的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英勇牺牲。因此，如何在敌人的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为迫切而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特科。次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1930年5月，聂荣臻从中共顺直省委调至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此外，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

顾顺章属于流氓无产者出身，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的积习甚重，而在特科工作，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接触三教九流，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上日益腐化。党中央伯顾顺章误入歧途，走向堕落，因此便派聂荣臻到特科加强政治领导。顾不愿别人对自己施加什么影响，就让聂荣臻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等行动工作。

搞行动，最基本的任务是抓捕、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摧毁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叛徒。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叛徒熟悉内情，掌握共产党的活动规律，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对付叛徒比对付特务还要困难。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聂荣臻以记者身份作掩护，人称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夜深方归，甘冒牢狱和杀身之险。

捕捉和审讯叛徒、特务，是件繁重、复杂而危险的工作，需要有勇有谋，坚定沉着。敌人得到一个有利用价值的特务，如获至宝，自然要用心着力保护。要逮捕和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无懈可击，使其无法抵赖，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鸡飞蛋打，而且自己很可能被捕或牺牲，甚至伤害同志。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危害共产党的事情刚一露头，打入敌人情



报网里的人就察觉了，及时转告中央，迅速采取对策。使共产党组织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后来，李立三让聂荣臻到镇江去组织武装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于是，聂荣臻带着伍云甫、涂作潮到了镇江。聂荣臻从镇江市委书记那里得悉起义根本没有条件，决定停止发动。而这位市委书记，已被敌人盯梢了。聂荣臻在旅馆同他谈话后，到街上买了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又在街上玩了一阵。当他回到旅馆时，看到他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职业习惯使他马上警觉到事情不妙，立即转身离开旅馆。

他徘徊在街头，决心回上海。天黑了，他走进一家澡堂。镇江的澡堂是彻夜不停业的，这为他提供了安身之所。他在澡堂洗了两个小时，在竹床上躺了一阵，已经是半夜了。怕待久了，引起别人怀疑，他又换了一个澡堂，再跳入浴池，好容易捱到天明才走出澡堂。外面细雨蒙蒙，街上渐渐有行人了，他便坐上一辆黄包车，直奔火车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从报上看到镇江市被敌人破获的消息。他回想起昨天的危险情景，感到实属不幸之中的有幸，稍微不甚，就会落入敌人布下的陷阱。接着，他又重返镇江把伍云甫、涂作潮两人顺利接回上海。

1930年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聂荣臻离开特科调到中央军委工作。

## 党的第一支妇女武装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起义浪潮也在海南岛兴起。1927年9月23日，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工农讨逆军总司令冯平领导海南八县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夏，起义军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遭到严重损失，杨善集牺牲，剩下百余人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29年9月，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主持召开各县委联席会议，决定了加强红军游击战的方针和方法，选出冯白驹为琼崖临时特委书记。

这时，蒋介石为反击张发奎、李宗仁部进攻广东，将驻海南岛的10个旅调走。

中共琼崖临时特委和各县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加强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扩大根据地。

1930年4月，临时特委在母瑞山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组成琼崖特委。决定进一步加强游击活动，扩大红军。8月，特委决定将红军独立团和分散作战的游击队编成琼崖红军独立师，由梁秉枢任师长，杨学哲任政委。

这时，海南的妇女群众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强烈要求挣脱各种势力套在她们身上的枷锁，不少妇女要求拿起枪杆，参加战斗。中共琼崖特委经过认真研究，为了保护妇女的积极性，以利于激发更多妇女的革命热忱，同意一部分妇女参加红军，组成女子军特务连。于是在万泉河畔的琼海县，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妇女武装，后来被人们称为红色娘子军连。

这个连共有120人，有119名战士和干部是妇女，只有一名司号员是男兵。第一任连长是庞琼花，指导员是王时香。以后在肃反时庞琼花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成员被撤职，王时香被捕后叛变了革命。排长冯增敏被提升为连长。

女子军特务连直属特委领导，主要是执行警卫和战斗勤务。例如，在特委和红3团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放哨，保卫苏区。有时也随主力上前线参战。由于她们认真负责，战斗勇敢，又善于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妇女群众的工作是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所以，很受农民群众的喜爱。

1932年8月，国民党绥靖公署专员陈光汉指挥国民党军1个警卫旅向琼崖根据地实行“围剿”，中共琼崖特委率领主力红军和女子军特务连转移到母瑞山区，继续抗击敌人。在一次抗击追剿敌军的战斗中，冯增敏指挥战士们与敌激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女子军特务连大部分牺牲，连长指导员等8人被俘。至此，女子军特务连宣告解体。

女子军特务连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任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冯增敏被特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她。毛主席还送给她一支冲锋枪，勉励海南岛妇女发扬革命传统，紧握枪杆，保卫祖国。以后，文艺工作者以这个连的故事为基础，编成歌剧《红色娘子军》，被搬上银幕，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

### 活捉张辉瓒

红军击破了湖南、江西军阀的“进剿”，蒋介石大为震惊，遂于1930年10月调集中央军10万人，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决心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敌人诱到根据地内，以便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迫使敌人分散、疲惫、发生错觉，暴露弱点，造成对红军有利的态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为了使红军和根据地群众都明白“诱敌深入”的好处，掌握和运用这一战法，战前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小布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为会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还作了富有说服力的动员报告，他详细说明了反“围剿”的有利条件和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动员会结束后，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小布设伏，为隐蔽企图，严格规定了战场纪律。白天不许做饭，进入阵地以后要严格伪装。可是一连两次进入伏击阵地，敌人都没有来。这时，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毛泽东耐心地向大家解释：“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后来查明，原来敌人谭道源师已经准备向小布前进，这时一个反革命分子从红色区域逃出去告密，说红军在小布有埋伏，敌师长谭道源听后，十分害怕，命令已出发的部队龟缩回去，所以红军才两次埋伏扑空。

这路没有打上，朱德、毛泽东研究后，决心选择另一路敌人打。侦察得知，敌18师师长张辉瓒占领东固以后，有东进之势。于是红军于12月29日迅速转移到黄陂西面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

29日晚，侦知张辉瓒师已占领龙冈，还有一个旅在东固，一个师分成两截，利于各个歼灭。判断这部分敌人第二天即30日，可能向君埠前进。龙冈到君埠必经黄竹岭，如果控制该山，即可扼制敌人的咽喉。毛泽东认为，敌人已被我们调动，部署分散，决心抓住战机，歼灭这部分敌人。于是立即向

红三军团、红4军下达了围歼张辉瓒师的作战命令，并用地图区分了各部的任务。令各部在30日拂晓前务必占领阵地，待敌进入口袋以后，10时发起总攻，朱德、毛泽东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黄竹岭后的小别山上，直接指挥战斗。

30日晨，满山浓雾，枫叶霜红，朱德、毛泽东到达指挥所，各部队也进入各自的攻击位置。不久，太阳冉冉升起，浓雾逐渐散去。红军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敌人吃过早饭后就从龙冈出发，向东行进。他们大摇大摆，不可一世的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还不知道灭亡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正当其先头部队喘着粗气向黄竹岭登山的时候，红3军7师给了敌人迎头一击。但是由于红军的装备差，火力弱，敌人并不在意，其部队向红军阵地猛冲。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敌人已展开约2个团的兵力，红7师感到战况吃紧，请求增援。而这时总部紧靠第红7师，除一个警卫连外，无援兵可派。朱德总司令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一点，没有兵就派将。于是派参谋处长到红7师指挥所，协助指挥，了解战况。战至15时左右，张辉瓒指挥的4个团已全部展开，多路猛攻。此时红12军从侧后向敌人反击，红4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高山上冲下来，敌人被红军四面冲杀，一片混乱。红军指战员对打乱了敌人展开各个围歼，不久将敌歼灭，18师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活捉。

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听完报告后，迅速从黄竹岭下山，向龙冈走去，沿途指战员都在传扬，“活捉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

毛泽东总政委走到龙冈大坪上，放下武器的俘虏已集合在大坪上，站成方队。战士们把张辉瓒押过来，只见他穿着士兵的灰棉布军衣，帽子也不见了。被俘时他隐瞒身份，说他是书记官，被一个被俘的士兵当场揭穿，他一路走，俘虏中有喊打声，有个俘虏上去就给他两个耳光，还说，“你压迫我们够了，现在 we 不怕你了。”张辉瓒立即鞠躬，口称：“润之先生”，说他过去如何敬仰、钦佩毛泽东。毛泽东叫他坐下，向他讲了简明的革命道理，又询问了一些敌军情况，张辉瓒一一作答，他还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给红军，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同志交待好好看管，不要杀他。后来有人不报告毛泽东政委，把他交地方去开群众大会斗争，结果在群众盛怒之下，把他杀了。

张辉瓒的警卫营长原是红3军军长黄公略的部下，他见红军冲上来，令全营集合好，当黄公略军长到来时，他令号兵吹号敬礼，全营举枪敬礼，他还向黄军长敬礼报告，然后带全营缴枪，他本人把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缴了。

这一仗歼灭18师师部和2个旅，共9000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 中国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无线电问世以后，给政府工作、军队作战、经济贸易、抢险救灾等带来极大的便利。

在古代，为了调动军队，使军队形成合力去打击敌人，就以烽火台报警，击鼓前进，鸣金收兵，各色旗帜指挥前进方向，设立各部的标识，各种简易信号，使军队运转自如。无线电台装备军队以后，使情报、情况、命令和指挥的效率大大提高，都希望运用这样的工具去捕捉战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是南昌起义，紧接着是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这些起义都是以正规军为主，但却失败和挫折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剩余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剩余人员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

那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本来就落后，红军在井冈山，装备就更落后，那时的指战员想了许多办法进行弥补。但不可能制造、装备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进攻红军的敌人装备了无线电台，给他们的进攻行动带来了便利。红军虽然没有无线电台，但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的情报搜集、传递仍然很快，作战指挥基本靠目视、音响信号和书信往来。敌人的电台传递快，但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难以及时得到准确的情报，所以战场上我军往往处于主动而敌人则陷入被动。

红军没有无线电台，与党中央、各军团和各革命根据地之间互不通信，给全局决策和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从这个角度说，红军迫切需要功率大的电台。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于1930年12月28日打响，毛泽东、朱德亲自到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由于进剿的敌人主力第18师师部和1个旅，在师长张辉瓒指挥下深入根据地，部队疲惫，信息不灵，补给不济，12月28日进到龙冈附近，处于被我歼击的不利态势，可敌人这时一点也没有察觉。毛泽东、朱德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牵制其他敌军，主力分为左右两路合围歼灭这股敌人。12月30日9时指战员在统一号令下，从四面八方突然冲杀出来，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消灭敌师部的战斗中，把张辉瓒的电台缴获了。可是那时红军战士大多是农民，许多人文化知识浅薄，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无线电台，更不知道它的用途，有的战士见发报机、电动马达、充电机等，认为既不能当枪使用去消灭敌人，又不能当给养，留下也是个负担，反正是敌人的装备，几名战士痛痛快快地把这些砸个粉碎，只剩下一部收报机。这部收报机送到总部，司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痛心，告诫各部队，这部用鲜血换来的电台被砸坏太可惜，今后应当注意。

这部电台的台长李仁忠、报务员王净、吴如生、韦文官和机务员刘盛炳、随台学习的人员刘寅也在这时参加了红军。没有发报机信息发不出去，但收报机还能用，可以抄收敌人的新闻电讯、侦听敌人电台情报，司令部组织电台人员运用这部电台收报机向总部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

砸发报机的事很快反映到红军总政委毛泽东那里，他甚感可惜，立即叫司令部向各单位发出指示，今后缴获无线电台，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等。

根据红军的发展和作战任务，利用缴获的收报机为基础，成立了红军总部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在东固附近的中村歼灭了公秉藩的第28师，又缴获师部的电台，红军有了完整的无线电台，经过调试和准备，1931年6月2日，红军前线电台同位于江西兴国的红军总部后方办事处，进行了第一次电报联络，从而结束了我军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历史。也为以后无线电通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阻止打“神兵”

1931年3月，红二军团缩编为红3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红8师第22团团长。由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指挥，部队连连被动失利。许光达奉命率团攻占了荆门，还未来得及休整，又奉命赶到慈化增援，遭到敌人十几个团的夹攻，部队伤亡很大。5月马良坪一战，红22团又被敌分割包围在一个小小的官帽山上。处境十分危急。许光达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奋勇作战。战斗间隙，他亲自带着人对官帽山四周地形作了详细侦察，发现西边悬崖边的两棵老树上，缠着又粗又长的葛藤直通崖下，于是决定从这儿突围。在他的指挥下，部队顺藤而下，绝处逢生。

在爬上一座山顶之后，许光达他们意外地发现山坪上有一个村庄，许光达正准备下令进村，突然，随着一阵锣响，村子里涌出了一大群头扎红帕子、身挂红布条、刀系红缨子的“神兵”。

当时，在四川与湖北交界的一带山村中，存在着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大刀会。这种组织信奉太上老君，自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而操纵这一组织的地主豪绅，则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常利用入会农民的愚昧，为他们打仗卖命。

这些“神兵”涌出之后，既不通姓名，也不问缘由，边舞动大刀，边狂叫着朝许光达和战士们杀过来。战士们见状，迅速推弹上膛，举枪瞄准了“神兵”。但这些“神兵”大概真的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之躯，竟毫无惧色继续往前冲喊。一场混战即将开始。

“同志们，这是大刀会的‘神兵’，一律不许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光达立即跃到高处，高声向部队下达了命令。接着，他又让人赶快喊话，告诉对方我们是红军，只是路过这里，绝不会伤害老百姓，请他们不要乱打。

然而，喊话无济于事，“神兵”们在头目的操纵下速度未减地继续朝前冲着。

“快，带队伍向山上撤！”许光达下了第二道命令。可部队一撤，“神兵”们更来劲了，跟着红军的屁股后面拚命地叫喊追杀。“团长，打吧，打几枪再撤，这样不行啊！”战士们在苦求着，许光达紧锁双眉根本不理睬，继续带着部队向后撤。

“妈的，老子给你点颜色看看”，突然，离许光达不远的的一个战士实在压不住火了，转身瞄向“神兵”就打。“叭”的一声，子弹飞向了“神兵”的上空。原来，这是许光达眼明手快，挥手将他的枪口拨朝了天。“不准开枪！”接着，许光达边撤边高声重申了刚才下达的命令：“同志们，‘神兵’都是老百姓，不许打！”就这样，红军300多人被这些“神兵”追着撤了下去，避免了一场混战。

以后，这些回过神来的“神兵”都很感动。

### 他讲话为啥咬牙切齿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在审查代表候选人资格时，有人提出：罗瑞卿太严肃，脸上没有笑容，一说话就咬牙切齿，人们都有些怕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得从他第二次负伤说起。

1931年2月，蒋介石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

任，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3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8个师、3个旅、3个航空队共20万人，集结完毕。4月1日，国民党军分兵四路开始进攻。

4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主动后撤到苏区腹地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敌人进入苏区后，步步为营，行动谨慎。到5月14日，红军盘马弯弓等了25天之久，敌王金钰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红军总部立即命令第一、三军团分路攻击运动之敌。红4军为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从正面阻击敌人。从富田到东固，中间由大山相隔，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敌人必经之地。5月16日，第11师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率部抢占了观音崖，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附近的独立家屋内。这所房子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着头。师特务连连长杨得志又带着战士在路旁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进入阵地，敌人的炮火袭击便开始了。火力甚猛，新搭的棚子也被炸塌了。罗瑞卿、曾士峨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神情专注地观察敌情。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翼的第33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点头说：“红33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只有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红33团阵地。”随即令杨得志派人通知红33团团团长聂鹤亭，让他们坚决顶住敌人。

杨得志刚把人派走，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火力扫射过来。罗瑞卿首当其冲，面部左颊中弹，他立即转身去扶房屋的门框，手没扶住便倒在房屋门前。由于子弹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注。曾士峨见状一面命令医生抢救，一面把满腔怒火和仇恨都集中于对付当面之敌。他命令杨得志率特务连去抢占红33团前面的那个山头，自己挥着驳壳枪冲下山去。

听说罗瑞卿负了伤，医术高明的叶青山飞身赶到。他见罗瑞卿左侧颞颌关节已被击穿，出血严重，应采取压迫止血法，但身边又找不到可应用的器械。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一块银元，情急生智，便将银元用几层纱布裹住，放在伤口处，实行了加压止血包扎，然后让人用担架将罗瑞卿抬到师救护所。在师救护所，有位护士不了解罗瑞卿的伤势，看到罗满脸血痂和泥土，便动手去清洗。这下，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找来了叶青山。叶赶了十多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血。这时罗瑞卿由于失血过多，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叶青山怕再出问题，便陪伴着罗，并决定马上把罗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叶青山和勤务兵王保林和两个民工，轮流抬着罗瑞卿，一路小心翼翼，每天多则走三四十里，少则一二十里，终于把罗平安送到上田后方医院。几天来，罗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他饿了就用手拍拍肚子，勤务员就喂他一点稀米糊，不想吃了就摇摇头。在医院，由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给作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手术。手术基本成功，但由于失血太多，加上一路烈日曝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陷入昏迷状态。罗烧得神志不清，讲胡话，有时呼唤：“叶青山……王保林……”

有一天，罗稍微清醒些，看到了叶青山，便立即让叶回前方去，不要管他。叶答应后，罗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个人说道：“棺材做得长一点，你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罗瑞卿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两个人说的大概就是自己。这下，自己可能活不成了，要去见马克思了。

然而，为他做的棺材没用上。他在昏迷数日后，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要归功于他年轻而又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定乐观的革命信念。这是他第二次大难不死。可是，这次负伤落下了一个后遗症，这就是嘴不能张大，吃饭困难，不能开怀大笑，说话也很吃力，显得有些咬牙切齿。

### 精细的红“管家”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杨立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第12军军需处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的困难环境下，他出色地领导后勤部队保证了部队的运输和供给。

1931年夏天，天气酷热。红军总部准备给每个战士添置一套夏军装。可那时红军的经费来源非常紧张，于是不得不规定；每人只能按3角5分钱的标准做衣服，颜色一律要灰色。负责承办的同志来到瑞金城一问，买一套衣服的灰色布就要4角1分。有的同志泄气地说：“算了，这几个钱做什么衣服！买点肉打个牙祭，改善改善生活吧！”

杨立三听说后，急了！他和给养员一口气从总部驻地叶坪跑到瑞金城，东转转，西看看，这问问，那瞧瞧，到处打听布价，忙出一身大汗，了解到：灰布确实买不起，然而白布却要便宜些；做一套衣服，买好的白布要3角，次的2角8分，去染坊染成灰色5分。杨立三便打算买白布到染坊染色。一转念，不行！这3角5分钱只能把布准备好，还要裁呢，缝呢，这工钱从哪里出呢？这使他十分为难。

杨立三皱着两道浓眉，心里又仔细合计了一番：买好布自己染色，每套只花3分钱买染料，又便宜了些。可再一打听，每套衣服的剪裁工要2分，缝纫工要3分，一一加起来，总共要3角8分，还是做不成。

他掰着指头算了又算，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得出了一个“最佳”方案：买次布每套2角8分，染料每套3分，加剪裁工2分，针线2分，合起来刚好3角5分，然后让战士们自己来缝。杨立三高兴得不得了，说：“就这样定了，自己缝，总共3角5分，不多不少，刚刚好！”

杨立三连夜赶回叶坪，向总部领导作了汇报。不久，红军战士都喜气洋洋地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新军服。

在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中央红军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中。首先住房缺乏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时红军队伍正是壮大的时候，没有住房怎么成呢？杨立三又着急了，他反复思索，有了主意。

一天，杨立三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问道：“谁会砍树？谁会木工？谁会砌墙？……”

“我会砍树。”

“我会木工。”

“我会……”

各种人才都出来了，大家乐了。杨立三带领大家爬上很高很高的山，嗨呀吭唷地干了起来：有的砍树，有的运木料，热火朝天。杨立三也是个闲不

住的人，刚在这边参加放倒一棵大树，又到那边夺过别人的斧子砍起来，圆圆的脸庞涨得通红，汗水顺着脖子直往下淌。等到树放完后，他的手掌都磨起了泡。

在杨立三的带领下，房架搭成了。没有瓦，便用稻草盖屋顶；没有铁钉，就用草绳捆扎。杨立三像个出色的工程师，不多天就设计建造了办公室、礼堂、宿舍等幢幢新屋。虽说是茅屋，冬暖夏凉，确实管用。

杨立三再领着大家在屋子周围挖地种菜，栽下了白菜、菠菜、四季葱等等。看到这崭新的景象，人们夸赞说：“杨副官长真是个好管家，红管家啊！”

### 独臂英雄刘正明

独臂英雄刘正明，江西永新县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刚满2岁父亲因终年劳累得病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弟兄3人东奔西走，讨饭为生，一家人长年不得温饱，过着以泪洗面的悲惨生活。

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刘正明从幼年便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一次，他同哥哥一起到田里捡了一篮子禾谷，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人称“巫鬼仔”的坏蛋，那家伙不由分辩硬说这禾谷是偷来的，并气势汹汹地抢夺篮子。刘正明咽不下这口恶气，便同这个坏家伙厮打起来，扯破了“巫鬼仔”的衣服，“巫鬼仔”狼狈不堪，只好不了了之。从此，刘正明便有了“蛮枯佬”的外号，意思是赞扬他不惧怕恶势力，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8岁那年，他在家难以糊口，只得背井离乡到山里去拜师学徒当篾匠。从这时起，他跟着师傅住在深山中的一座破庙里，终日辛劳，将编好的蔑器挑到几十里的山外，逢墟赶集，摆摊或沿村叫卖。这样的日子他一直熬了近10年。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率队伍到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刘正明的家乡离永新只有几十里，革命的浪潮迅速波及到这偏僻的山庄，土豪劣绅吓得东躲西藏，劳苦大众高兴得开怀大笑。这时，刘正明从山里回到炎村，参加了农民纠察队，不论是站岗放哨，抓土豪劣绅游街示众，还是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样样工作都抢着干。过去那些神气十足不可一世的地主老财，如今见到他都老远躲开。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刘正明家分到了田地和“浮财”，他家借地主刘德香的200元阎王债的借据也付之一炬。世道变了，穷苦人终于直起了腰，昂起了头，过上了舒心日子，当家做了主人。

1928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发动“会剿”，叫嚷：“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一天，几百名白狗子和反动民团一起冲进了炎村，疯狂的敌人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还牵走了刘正明家的牛，砸烂了他家的锅，杀害了他哥哥和40多名乡亲，并放火几乎烧光了村里的全部房子。敌人的残暴罪行，在刘正明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30年春，刘正明报名参加了红军。临行那天，苦命的妈妈眼含热泪为他送行，刚过门10多天的新媳妇二妹子，边为他整理衣物，边深情地对他说：“你放心走吧，要多杀敌人，多缴枪，我和娘在屋里等着你的喜报，等着你早日回家团聚。”刘正明和亲人依依惜别，带着他们的嘱托和厚望，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踏上了



战斗的征途。

刘正明参军后，编入永新县独立团当战士。独立团新成立不久，人多枪少，每个连只有几支枪，大部分还是大刀、梭标。刘正明没有发到枪，盼望着早日参加打仗，从敌人手里缴支枪，才好杀敌立功，报仇雪恨。不久，独立团参加第八次打吉安的战斗。战斗中，刘正明异常勇敢，端着梭标冲入敌阵，一枪刺死了一个敌人，敌人的尸体从山岩边滚到了河里，枪也落入河中。刘正明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河里去捞枪。正在这时，撤退的号声响了起来。刘正明要枪心切继续打捞，班长硬把他从河里拽了出来，结果枪没有得到，还受到严厉批评。这次战斗后，独立团因为武器严重不足，上级决定该团暂时解散，等有条件时再重新组建。

刘正明怎么也没想到刚当兵不久，部队会解散，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回到村里，有人不理解说三道四，甚至怀疑他是怕苦怕死开小差跑回来的。刘正明在家度日如年，三天两头出去打听独立团重新集中的消息。不到一个月，县里来了消息，说红军打长沙缴获了不少武器，通知原独立团的人到莲花县去领枪。刘正明当天快步如飞地赶到莲花县，领到了一支步枪，被编到红 12 军红 34 师直属炮连当战士。从原来的地方武装上升到正规红军，别提心中有多么高兴了。

刘正明在连队跟一个高个子排长学习射击技术，十分用心，进步甚快。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他和排长密切配合，自己双手紧抱炮筒，让排长稳当地装填发射，一下击中敌人的机枪阵地，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战后，他受到连首长的表扬，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连里增加了步兵班，刘正明当了步兵班的班长，他对待班里的战士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处处关心爱护他们，深受同志们的尊重与爱戴。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刘正明班占领一个山头阵地，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全班最后打到只剩下 2 颗手榴弹和十几发子弹，仍然顽强坚持战斗，守住了阵地。这一仗，他们连俘虏 130 多名敌人。战后，在评功表彰会上，刘正明班是全军通报嘉奖的模范班。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红 12 军奉命攻打石城县城。城四周是石头垒起的城墙，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正明班受命配合特务连从北门强攻入城。他带领全班扎了两个竹梯，并奋不顾身地向城上爬去。守城敌人慌忙从城上扔下带油的火把，一个火把正好扔在刘正明的头上，顿时火油溅了他一脸，头发也烧着了，衣服冒起了青烟，痛苦难忍，便从 10 多米高的竹梯上跌了下来。他就地一滚，滚灭了身上的火苗，随即大喊：“冲啊！”勇猛地攀梯登上城墙。这次战斗，红军攻克了石城县城，活捉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贡庭，缴枪 200 多支，子弹 1 万多发。刘正明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为广大指战员称赞。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正明奉命带 1 个班，佯称红军 1 个师，沿途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到处书写标语，散布消息，搞得敌人扑朔迷离，狼狈不堪，十分疲惫。战后，刘正明作为红 4 军红 12 师直属队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2 年 9 月，中央红军分四路将乐安县城包围后，在林彪和聂荣臻的统一指挥下，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乐安守军系国民党军第 27 师近一个旅依城固守，负隅顽抗，红军攻击暂时未能得手。红军调整部署，继续强攻。红 34 师师政委黄一善亲率部队冲锋，刘正明等数十名战士紧随其后。将抵近

城墙时，敌人一架飞机俯冲过来，向红军进行猛烈扫射。为了保护师首长和同志的安全，刘正明冒着生命危险，端枪接连向敌机射击。突然，他感到右臂一阵麻木和疼痛，很快便失去知觉，一下倒在阵地上。

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在红色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右臂骨头被打折，伤势严重，为了保住生命，医生不得已给他做了截肢手术。刘正明发现自己失去了右臂，顿时像发疯似地用左手敲打着床板，连哭带喊：“你们为什么截掉我的右臂，我还年轻，我还要打仗，没有了右手，叫我怎么打枪呀？”

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一下失去了右臂，心中的痛苦自不待言。医生好言相劝，同房的病友也极力安慰。刘正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伤好后无论如何也要重返战斗部队，再上火线冲锋陷阵。伤势稍有好转，他就用左手坚持刻苦锻炼。吃饭的时候也不消停，蹲在地上，把饭碗夹在大腿中间，左手拿筷子，将饭菜往嘴里拨。打绑腿时，用脚指夹住绑带，用左手缠绑腿布。捆背包连牙都用上了，同手脚相配合，把背包打得结结实实，整齐美观。他还抓紧空余时间学文化，练写字，时间不长居然可以看书看报了。

伤好后，刘正明被分配到第一残废医院工作。他开始从心里不乐意，几次去找红军卫生部长贺诚，央求去前线。贺部长语重心长地说：“你失去了右臂，一只手怎么能拿枪打仗呢？到残废医院工作，是党组织的安排，更适合你的身体状况，还是愉快服从吧！”刘正明被说服了。

刘正明被分配到第三疗养所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疗养所在兴国县乌龙冈，有一幢四进八间砖砌的房子和一座祠堂，周围竹木扶疏，花草掩映，环境清静幽雅。所内常有100多名休养员，多系一些缺胳膊少腿或双目失明的一、二等残废军人，组织上安排这些人到这里疗养，给予了良好的照顾，没有分配任何工作，可是这些昔日战场上的英雄，谁也不愿无所事事，坐享其成，纷纷要求组织上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革命尽心出力，作点贡献。

刘正明发现这里依山傍水，地理条件优越，便同指导员商量，决定组织休养员开荒生产，饲养畜禽。党支部分工，由刘正明任生产总指挥。全所同志自愿献出残废金，购买生产工具、种子、猪崽、雏鸡，开展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刘正明不能使锹用镐，就组织人编竹器，打草鞋，带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后来，他们还自熬硝盐，用硝支援军工厂制造手榴弹、土地雷，自制的盐除自己吃外，多余的还送给其他疗养院和红军医院。

秋天到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年，全所晒了2万多斤干菜，收了500多斤花生，400多斤绿豆，养了16一头猪，300多只鸡，熬制10几锅硝盐。他们不仅实现了生活上自给自足，还节余了500多块银元。刘正明带领慰问小组，把2万多斤干菜、5头猪和300多双草鞋作为慰劳品，送给了前线部队。年终，在全苏区医院、疗养院评比中，第三疗养所获得了红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后，刘正明也随军行动。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他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二渡赤水后，他时常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可他总是一声不吭，咬紧牙关坚持着。一次，部队抢渡大场圩河，他突然昏倒在地，两眼发直。经医生诊断，他患了急性肺炎转伤寒病，便找副担架抬着他行军。

做收容工作的刘正明，深知部队当时的艰难处境。由于行军作战频繁，部队异常疲惫，加之担架不多，许多同志，甚至连高级干部生病都不愿意躺

在担架上，自己怎么可以睡担架让别人抬着走呢？他硬是从担架上下来，任凭同志们怎么劝说，就是不肯坐担架。他找了一根树枝作拐棍拄着，让勤务连一个小同志扶着他，艰难地行进在征途中。

一天，收容队指导员对刘正明说：“今夜部队要急行军，要走100多里。上级决定，实在不能走的同志寄住在老乡家里，每人发一支枪，25元生活费。我们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决定你也寄住在这里。”

刘正明心里很矛盾，觉得离开队伍不甘心，不离开又怕给别人添麻烦。他把自己身上的行李包裹解下来，交给指导员说：“马指导员，你如信得过我，就托你帮我把它带上，三天后不见我拿行李，就自行处理掉。”

部队急行军出发了，刘正明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摇摇摆摆跟在队伍后面行走。开始，他还紧跟着走了几十里路，慢慢两腿不听使唤了，连站立都感到困难。空旷的山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夜幕降临，漆黑一片，刘正明本能地摸了摸手枪，里面还有几发子弹，自然胆子也壮了起来。实在站不住了，就爬着走。遇到下坡，便干脆滚着下山。就这样，他靠着惊人的毅力追赶着队伍，在第二天黄昏时奇迹出现了，居然追上了红军。

四渡赤水进军云南之后，红军进入更加艰难困苦的历程。在翻越雪山时，组织上派了两个特派员照顾刘正明。一路上，他们帮刘背着行装，有时还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捱地行进。雪山口风大路险，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气力。他两人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连推带拽，使刘正明通过了危险地段。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同志间的手足情谊，使刘正明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觉得只有一辈子跟着党，革命到底，才能对得起党和同志们。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刘正明以残废之体战胜了重重磨难也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刘正明身残志坚，心明眼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跟党走，矢志干革命，拼死也要跟上红军队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出色的模范行动，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评价和赞扬。1936年，他被授予“模范特派员”的光荣称号。

不久，刘正明被派到山西临汾兵站担任了政委。后来，又到延安七里铺担任六个行政村的主任。抗日战争中，他带领群众，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正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行政办公室主任。1960年离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他不顾年事已高，身残体弱，不遗余力地从事教育青少年的工作，大讲革命传统。先后担任过10多所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作传统报告70多场，听讲的青少年达20多万人次。为了把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从1979年开始，他以惊人的毅力，左手握笔，克服了文化低、写作不便等困难，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史料。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蛮牯佬从军记》，在广大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 威震晋西的红军游击队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影响下，各地中共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军阀的反动和大小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勾心斗角所造成的空隙，纷纷起义成立革命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尤其在农村更是风起云涌。山西

的混乱局面，为移植井冈山的革命火种，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形势下，阎红彦奉中共陕北特委派遣，于 1931 年夏，赴山西担负创建工农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使命。常言道：“万事开头难”。要在四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去组织革命武装，其危险和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需要热情和信心，更需要勇气和智慧。阎红彦经过陕北革命烽火的熏陶，早将个人的身心编织在了共产主义的伟业之中了，所以，他有着这方面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根据山西省委决定，首先要在岗岳起伏、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土豪劣绅残酷压迫、农民生活痛苦不堪的吕梁山一带创建工农武装。准备工作是在极为秘密和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阎红彦时而以国民党军官身份，时而以富商的身份，巧妙地通过敌人层层哨卡，来往于吕梁山、汾阳与太原之间，进行组织联络工作，把上级调来的人员和零散的武器，以及省委的指示精神，安全地送到山区；又把晋西各县的斗争发展情况汇报给省委。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不久，游击队的骨干成员已达 30 多人，长短枪支 25 支，还成立了秘密联络点。之后，阎红彦又亲自出马策动驻汾阳县永安镇的阎锡山军一个排起义，经过多方工作和谋划，起义人员击毙连长向吕梁山转移。当队伍西进王家池时，突遭敌兵追击，双方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打得很艰苦。战斗中几个不坚定的起义士兵，见形势险要力量悬殊，又想反水，竟将枪口对准了阎红彦，阎红彦在这紧要关头，沉着镇定地对他们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们服从指挥，最终达到了策动的成功。

后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在孝义县西泉村正式宣告诞生。院内贴着大幅标语，非常隆重热闹。大队总支书记杨重远在大会上宣读誓词，全体队员举手宣誓：“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表决心，革命到底不动摇。”随后，副队长兼一中队长阎红彦讲了革命斗争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扩大红军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特别对朱毛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进行了生动的讲解。他的讲话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大家听了倍受鼓舞。

有了红军游击队这样一支革命武装，沉寂的吕梁山终于沸腾了，晋西游击队，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补家庄、石楼县老鸭掌等地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迅速建立起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抗粮、抗税、制裁地主恶霸的斗争。

当时，孝义县群众反映有个姓武的恶霸地主，依仗其儿子当山西省政府财政局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给予惩治。根据这一情况，阎红彦决定铲除这个“地头蛇”为民出气，以鼓舞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可是这个姓武的家伙听说红军要来了，早已逃到了百里之外的张兰镇去了。张兰镇地处平原，地形开阔并有重兵把守、封锁严密。一天阎红彦带领 3 名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虎穴。到了中午晴日当空，繁乱的张兰镇显得很闷热，只听姓武的恶霸的家了向主子通报说：“老爷，门外有远方的高朋求见。”“进来吧！”姓武的恶霸随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只见身穿月白色绸大褂，戴着墨镜和洋草帽的阎红彦已到了他的跟前，当手枪抵着他时，吓得魂不附体，作梦也没想到游击队会在这里降临。很快将其押

回游击区。之后，在碾头村对姓武的恶霸进行了公审，组织群众清算了他的剥削帐，最后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处决了这个恶霸。此举震慑了远近的恶霸地主，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不少的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加入游击队。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晋西游击队移住西宋庄。这个大庄靠近吕梁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利于根据地建设。在这里游击队得以集训休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主动向周围村镇出击，消灭敌人，扩大游击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31年夏的一天，游击队获悉调来“围剿”晋西游击队的国民党军1个连正抵驻石楼县水头镇的情报。在阎红彦主持下，游击队的队委会研究决定，于敌出击必经之途，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夜幕降临之后，阎红彦率队趁朦胧的月色向水头镇方向挺进，在夜幕的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部署。次日拂晓时分，敌人的几个侦察兵探头探脑地首先出现在山间小道上，游击队没有惊动他们。只见天色朦胧、四周静悄悄的，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敌人放心地懒洋洋地拖着长队向前开进。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只听阎红彦一声枪响，高喊“打！同志们狠狠地打！”随声便见游击队四起猛射敌群。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懵头转向的敌人，像无头苍蝇在山间东荡西撞，顷刻间死伤过半。所剩之敌拚命往山里逃窜，并妄图占领制高点，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猛击，又杀敌一部。经过激战，游击队大获全胜，仅俘虏就抓了50多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这是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

不久，游击队即发展到百余人，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太原报纸惊呼“晋西半壁，几成土匪世界。”

### 营救“反革命”

30年代初，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肆虐，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十分严重。部队不是全力对敌，却提出什么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什么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大批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遭到无辜的监禁、枪杀。对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其间分别任过红军独立师师长、红9军第27师师长、红25军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非常痛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千方百计进行抵制，想方设法营救和保护受迫害的同志。

一天，他正在吃饭。突然，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在家乡当过自卫军的人，跑来向他哭诉：“师长，我是偷着跑出来投奔你的，上面要抓我‘反革命’啊。”对这个人徐海东是了解的，从13岁起就成了红军战士，此后一直作战勇敢、英勇杀敌，这样一个铁心干革命的人，怎么突然变成了“反革命”了呢。原来，定他反革命的理由，是因他说过他们排里跑掉的两名战士，是因为红军内部乱抓“反革命”给吓跑的。

“简直是胡闹！”徐海东气愤地说。接着他又余气未消地说：“你就留在我这里，没有人敢抓你！”然而，“左”的思想很严重的师政委却反对这样做，提醒徐海东要提高警惕。徐海东坚持自己的意见，更加激昂地说：“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现在他要革命，却走投无路，我们应该收留。这样的‘反革命’我徐海东要！”

有一次，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吃饭时以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我们可不能只想到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的不纯啊！”徐海东也很严肃地顶了一句：“当兵的就是要想到打仗！”

不久，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所属第202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徐海东见后十分惊奇，当场质问政委：“他们犯了什么错误？逮捕人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徐海东听说政委又要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起去。去后，徐海东见政委把第79团特务连的指导员吊了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徐海东想，这个指导员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才只有17岁，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就叫他的警卫员把指导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气得脸色发青，大声质问：“一点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政委却对徐海东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气得徐海东流下了眼泪。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可在这个时候，全军团依然还有300余名干部战士，被“左”倾分子定为“反革命嫌疑犯”，为了不使这些同到杀害，徐海东曾拍着桌子同“左”倾路线的积极执行吵大闹，据理力争，并始终在找机会给这些同志搞掉“帽子”。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徐海东以他坦荡的性格，宽阔的胸怀和对党的忠诚，直言向中央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即指示：“统统释放”、“一律恢复组织生活”。

徐海东听了，兴奋得像小孩子似的，立即返回军团部，下令将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请到军团部门前。徐海东深情地看着眼前这些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激动万分，还未开口，泪已盈眶，刚说了二声：“同志们！”便呜咽得说不下去了。当他传达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之后，几百名蒙受冤屈的干部战士，个个早已是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了。

### 是水硬，还是石头硬？

1930年，正当红7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准备开辟新的局面之际，“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给红7军下达了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对此，前委讨论的时候虽有怀疑，但还是从组织上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进。

由于中央指示的“左”倾冒险性和错误的作战指导方针，红7军在从河池北进途中，几次进攻敌重兵防守的坚固要点，都受重挫，部队士气十分低落。

为了稳定部队情绪，使全军指战员在困难形势下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军长张云逸亲自在军人大会上作动员。开始，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风趣的问题：

“同志们，你们说，是石头硬，还是水硬？”

张云逸的语音一落，会场上马上活跃起来，在一阵又说又笑的议论之后，有人高声说：“是石头硬，石头硬！”

“不对呀，同志们，你们说是石头硬，这不对。我看是水硬，而不是石

头硬。”等大家作了回答以后，张云逸微笑着反驳道。他见指战员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便进一步解释道。“表面看石头比水硬，但实质上石头并不硬，它连一滴水珠都经不住。不信，你们看屋檐下的石头，不就是被水滴冲凹了吗？洪水还可以把石头搬家，冲得那小石块就只好变成细沙了。”说到这里，张云逸话锋一转，继续道：“白军也是这样，它再硬也必定要失败！红7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是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巨浪，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道路。”“同志们，我们不要看目前的几次受挫，这不等于敌人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不是靠一两次仗就可以打出来的，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最后，他用十分坚定的语气，高声讲道：“红7军能从无到有，就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直到战胜敌人。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我们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此时，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指战员被军长的动员所打动，倍受鼓舞，士气很高。随之，会场上空回荡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口号声。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红7军转战桂、粤、湘、赣四省，行程7000余里，在敌强我弱的危险境地中，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影响，征服了种种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沿途播撒了革命种子，最终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目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当时，为表彰红7军的不朽功绩，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曾特奖给大红旗一面，上书四个大字：“转战千里”。

### 党最早设立的国家最高军事机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军事问题的重要，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逐步建立起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起根据地政权。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于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中央第一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建立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主要担负军事宣传、联络工作，没有领导和指挥军队的职能。同年12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央军事部，相继由张国焘、周恩来担任军事部长。1926年底，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担负在北伐军和蒋军队伍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和领导群众支援北伐战争。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恢复中央军事部，杨殷、周恩来相继任部长，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参谋、组织、士兵、特务、交通等5个科。

1930年3月，根据红军力量的壮大，中共中央决定将军事部更名为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军事委员会，由关向应任书记。8月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建立，为设立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打下了基础。

根据地发展了，需要建立领导机关。193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赣西南特别委员会的指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

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扩大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苏区统一的政权机关，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进行民主选举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为加强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根据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即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12月中旬，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从此中央军委在形式上成为国家政权系统的一个机构，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1982年12月，召开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它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机构，只是在党内和国家机构内同时具有领导地位，统一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

### 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机构。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中共设立的军事机关只是宣传和组织群众。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相继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党对军事斗争不仅是从政治上领导，而且急需从军事上指导。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设立军事科，作为党中央掌管军事的一个专职部门。

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决定恢复军事部，由杨殷、周恩来相继任部长，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参谋、组织、士兵、特务、交通等5个科。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军事部更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关向应任书记，8月以后由周恩来任书记，作为党对各地军事斗争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由于军事委员会设在上海，对各革命根据地的敌情、民情、我军情况不甚了解，还不能进行战略战役指导，更不能进行作战指挥，只是对各战略区的指挥干部、药品及必须物资的补充、少数伤员的安置，及组织重要信息交流等，实际上只能起到联络作用。

能行使指挥和领导职能的，是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命令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作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军委才直接对红一、二、四方面军行使作战指挥职能。

### 最早成立的红军总部

总部，是总揽全局和统率、指挥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各部门的总称。有的军队有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等。有的军队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



部和各军、兵种总部等。有的虽然名称不叫总部，但行使与总部相同的职权，例如南昌起义的参谋团，实际行使的是总参谋部的职权。

中国工农红军由于起义的时间、地点和参加的人数不等，各地起义都有统一的指挥机关，但没有全国性继往开来指挥军队作战和建设的总部机关。随着红军的扩大，作战的协调，军队建设，兵员和装备编成，军队给养和弹药的补给，卫生救护，军队的教育训练，通信联络等，仅靠军队最高领导人是难以完成那样复杂而时效性很高的工作任务，于是急需建立最高的领导部门。工农红军建立初期，各地红军之间从战略、战役上不能互相配合，只能独立作战和活动，所以成立红军总部的时间也不一样。

最早正式成立的红军总部是在 1931 年 11 月。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没有设总部，但已有总部的趋势。在革命委员会下设有总政治部、参谋团。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参谋团委员是以周恩来为首，刘伯承任参谋长，吴玉章任秘书长，军队行动的总指挥是贺龙，前敌总指挥是叶挺。

红军队伍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 年江西苏区的红军已发展到 3 个军团，中共中央 6 月发出指示，为协调 3 个军团的行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

这时的红军总部还只能对红一方面军实行作战指挥，对鄂豫皖、湘鄂西、华南、四川等地的红军只能是象征性地指挥。

1933 年 5 月，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命令，将中革军委移至江西瑞金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前方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聂荣臻、贺昌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总部机构进一步完善，负责中国工农红军的组织、给养、教育训练、作战指挥等，还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明确规定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职务。

由于红军总部主要在前线指挥作战，统揽全局的军事工作由博古、项英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操纵，他们不切实际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最初设立的总参谋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总参谋部，是由做群众性的军事工作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军事领导和指挥军队的专门领导机关。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周恩来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到武汉以后，于 5 月 22 日列席了中共中央第九次常委会议，25 日又列席第十次常委会议。鉴于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军事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地位更加重要，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担任军事部部长。中央军事部是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原只有聂荣臻、欧

阳钦等五六人。周恩来任部长后增加了几位黄埔四期的学生，总共不到 10 人。军事部不指挥军队，只负责军事工作的宣传、联络工作，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先后派遣了包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一批共产党员，还指导武汉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军。这个军事部实际起到中共中央总参谋部的作用，军事部中负责参谋长工作的是聂荣臻，这样的军事部门为党的军事领导和参谋机关起了先导作用。

南昌起义成功后，为统一指挥军事行动，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军事参谋团，由周恩来、叶挺、贺龙、蔡廷锴为参谋团成员，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参谋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打到广东的决定，选择了取道临川、会昌、东江的路线，制定了出发时间、注意事项。行军中参谋团不断地组织侦察敌情，指挥各军作战，组织协同事项，起到了很好的参谋部的作用。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急需建立一个统一参谋机关协助首长指挥作战。负责搜集情报、制定计划，组织部队协同，管理军队，组织通信联络等工作。1931 年 11 月 25 日，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在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军医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任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部部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十分重视参谋机关的建设，他向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的建议。朱德同志对此极表赞成，取消了不合理的部门，在总参谋部设立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管理等部门。为提高参谋人员素质，叶剑英亲自给参谋人员上课，组织大家学习研究苏联红军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结合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总参谋部和有关参谋工作的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参谋工作条令和条例。总参谋部还将缴获的电台和俘虏的电台人员经过教育后，作为无线电通信的骨干，培训电台工作人员，逐步建立起无线电通信系统，在保障我军命令指示和情报的传递、搜集敌人情报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总参谋部建立以后，就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制定详细的计划，传达首长决心，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做出很大成绩，取得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受到中央军委领导人的称赞。1932 年总参谋部部长改称为总参谋长，一直沿用至今。

## 以信任换信任

1931 年 12 月，国民党 26 路军 1.7 万名官兵在宁都宣布起义，参加了红军。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肖劲光，被党组织派到这支改编为红五军团的起义部队，任政治委员，做团结、教育和改造起义官兵的工作。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肖劲光在做向部队灌输革命道理、介绍红军任务制度、关心官兵生活等各方面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总指挥季振同的工作。

季振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很有些绿林好汉气质。在这支起义部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虽不是科班的军校出身，但聪明能干、性格豪爽、勇敢果断，从军以来深得冯玉祥的厚爱，曾做过冯的贴身卫队手枪旅旅长，起义前是 26 路军的主力、装备精良的第 74 旅旅长，要使这支起义部队的改造取得成功，团结改造季振同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肖劲光到任之初，季振同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存有一定的戒心，对这位 28 岁的政治委员，虽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那里略知一二，但他不知道这位颇有阅历的政治委员的秉性究竟如何，有些忐忑不安。

“我不懂红军的规矩，不懂红军的战术，这个总指挥恐怕是做不了？”一天，季振同忧心忡忡地向肖劲光说道。

“这是哪里的话，冯玉祥的部队素以治军严谨、作战勇猛著称，有不少绝招值得红军学习呢。我参加过北伐战争，我了解你们国民党将领，其中很多是有真才实学的。”肖劲光肯定地说道。几句推心置腹的话，说得季振同心里热乎乎的，神态也自如了些，初次交谈挺投机。接着肖劲光又说：“自然，红军打仗有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点，这不难学。我们来个君子协定，红军的这一套我包教你，你们的擒拿格斗我很欣赏，你包教我，怎么样？”听到这里，季振同深被肖劲光的坦率和真诚所打动，兴奋地说：“好！我们一言为定。”

肖劲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十分耐心地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及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军民关系等等都一一介绍给季振同，也循序渐进地灌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道理。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十分尊重和支持季振同的工作，注重维护总指挥在部队中的威信。每逢部队训练，肖劲光都到场，十分虚心地问这问那。就这样“君子协定”履行得十分默契。

季振同生性活泼好动，肖劲光虽然深沉，但也不乏幽默。有一次，肖劲光听说部队反映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概念不清楚，便自编了一个独幕话剧，邀季振同同台演出。肖劲光扮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两人在台上一唱一和，十分精彩。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开玩笑时还互相以“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相称。

部队在进行民主改造之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些军官对红军中建立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不准体罚，大家发一样的伙食标准等新的规定不满意，有些军官便提出要离开部队。季振同对此束手无策，起初对党的政策亦有怀疑。为了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肖劲光立即从九堡赶到瑞金，向中央军委请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然而，当时有些领导同志对这一问题看得过重，个别还提出要用武力解决。肖劲光心急如焚，他知道武力解决的后果，只能使部队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他认真地建议：“先不要采用这样的办法，待做做工作再说吧。”肖劲光找到担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情况，毛泽东也不同意用武力解决。他说，怎么能用武力解决呢？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你回去对他们说，宁都暴动参加红军是他们自愿来的，我们欢迎。如果他们认为这里不好，想回去，我们欢送。肖劲光当天赶回九堡，把毛泽东的话原原本本地一说，季振同激动地一拍桌子：“好！同意！赞成！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马上走出去。对那些想走的军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愿意革命的我们欢迎，愿意走的我们欢送。他还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分给要走的军官，一场风波很快平息了。

从肖劲光的身上，季振同对共产党、对红军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和信任。不久，他向肖劲光提出了入党申请，肖劲光亲赴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局请示，由朱德和周恩来做介绍人，批准季振同为特别党员。

一次，季振同曾感慨地当面对肖劲光说：“我起义当红军，第一个是相信刘伯坚，第二个是相信毛泽东。我很幸运啊，现在又遇见了你这样一个好

政治委员，这样信得过我。”肖劲光以尊重信任，换来了季振同的尊重信任，两个人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使红五军团的改造工作得以顺利和成功。

### “敢死队”队长李天佑

李天佑上将，一生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这里仅讲他在1932年1月，任特务连长时率队参加攻打赣州城的英勇事迹，便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这次战役虽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顽固坚持进行的一次错误军事行动，使红军损兵折将，蒙受重大损失，但部队却打得英勇顽强，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赣州是江西省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三面环水，河宽流急，章水和贡水夹城相汇为赣江，向北奔腾而去。200多里的河岸多系悬崖峭壁，河水流经18处险滩，其中以惶恐滩为最。宋代重臣名将民族英雄文天祥途经这里和零丁洋（又作伶仃洋），留下了动人心弦、脸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它城高墙厚，气势雄伟，十分坚固，城垛间鼓角相闻，守城敌军有金汉鼎第12师马昆旅约3000人，另有反动地主武装和保安团万余人，可谓兵力雄厚，火器充足，确实易守难攻。赣州城北，紧靠城墙有八境台，当时为城中最高建筑，登此台不仅可以眺望赣州八景，而且可供军事瞭望。从今人的《登八境台》诗：“常思幽境有闲愁，今睹英姿上此楼。二水环城称险要，三台鼎立谓风流。”人们也不难想象赣州城，作为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为打赣州，红军各团、营、连都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李天佑和全连同志们一起，不顾天气寒冷，摸爬滚打，苦练攀登、爆破、投弹、刺杀等技术，学习巷战本领。他们都磨拳擦掌，纷纷表示：上级指到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一定要打下赣州。

根据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红三军团主力攻打南门，红7军攻打东门。红7部队把东门外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打通，在街道中间用沙袋垒成工事，封锁城东门，以掩护挖坑道爆破城墙的部队。

坑道口，选择在街前的一个土坎后面，距城墙约四五十米。爆破队刚破土挖坑道口，就被城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疯狂地用火药封锁，扔下汽油火球烧城外的民房，对坑道作业威胁很大。但爆破队员们不畏艰险，冒着敌人的弹雨，分组轮流作业，日以继夜。敌人为了发现坑道掘进路线，便在城墙脚下埋设水缸，有的缸装上水，看震动的水波，有的缸倒扣，听震动传播的声音。因此，只要一挖坑道，敌人就向坑道上的地面实施炮火轰击。坑道越往前挖，危险性越大。当坑道接近城墙根时，敌人两架轰炸机不停地在作业点上空盘旋、投弹，企图炸毁坑道。为了保护坑道，李天佑指挥红7军特务连向城头上的敌人射击，朝低空盘旋的飞机射击，有时吓得敌机盲目扔下几颗炸弹，掉头飞走。在特务连和兄弟连队掩护下，爆破队经过10多天的苦战，终于挖通了延伸到城墙底下的坑道，并挖好了炸药室。

为了装炸药，3副“棺材”从军特务连的驻地搬运到炸药室，里面填满了炸药，准备在攻城时点火爆破。

一天，敌人突然以1个营的兵力，从城东门向坑道口蜂拥而来。有100

多名敌人已冲到东门外的街上。街道两侧红军的部队奋勇追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向城里逃去。

这时，80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身强力壮、作战勇敢的“敢死队”队员来到前沿，向城墙逼近。他们每人携带手枪1支，手榴弹4枚，大刀1把，任务是在城墙炸开后，迅速突击城内，为大部队进城打开通路。红7军的部队已在东门外街道后面的空地上，准备攻城。彭德怀军团长来到东门外，检查了爆破和攻城的准备工作，他说：“能不能炸毁城墙，是攻城的关键，你们必须多做几手打算。”

总攻命令下达后，各部队迅速发起了攻击。在东门外城外，爆破队同志迅速进入坑道，点燃导火索。突然，“轰隆！”一声巨响，3副棺材里的炸药同时爆炸，迸发出无比的威力，好似天崩地裂，震得山摇地动。顷刻，硝烟滚滚，尘土弥漫，火光冲天，城墙被炸开几十米宽的一道缺口。城墙上的敌人随着烟尘腾空而起，向四周摔去，死伤甚众。但没想到，由于爆炸威力太大，城墙向外崩塌，预先埋伏在城墙脚下的80多名“敢死队”队员，几乎全部埋进土里。前线指挥红7军红55团团团长黄冕昌，高声大喊：“冲呀！”

红7军两个团的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争先恐后向东门城墙缺口处冲击。红55团第6连连长莫文骅带头冲锋，负了伤，倒在城墙脚下；红56团营教导员陈漫远负了伤，被担架抬走。攻城部队被阻于城下。军团部让黄冕昌重新组织攻城，黄让李天佑连组成敢死队，准备突击。

李天佑早就按捺不住了，挺身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他集合全连，逐个检查战士的身体和武器装备。特务连个个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的，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好，而且作风过硬，技术娴熟。李天佑检查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红三军团没有马上重新攻城，让红7军和其他部队从上到下进行了战斗总结，并进行了充分战斗准备，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又挖出了一条直达城墙的70多米的坑道。爆破队长姜茂生和4个战士，准备点火爆破，其余人员全部撤至安全地带隐蔽。另外，红一方面军还调整了攻击部署和兵力。

李天佑率领经过挑选的70多名战士组成的“敢死队”，顺利进入前沿阵地。他们手握驳壳枪，腰别手榴弹，精神抖擞，密切注视着爆破点的动静。

“轰！”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浓烟滚滚，尘土飞扬。李天佑双目圆睁，一跃而起，冒着纷纷降落的沙石，带领“敢死队”冲向城墙崩坍的缺口。他一边冲，一边喊：“同志们，跟我上！”

特务连队员们跟着连长冲上去，被震昏的敌人也清醒了过来。敌人凭借装备精良，火力猛烈，组织反击。李天佑率领“敢死队”冲上去，又被敌人压了下来，队员们死伤甚多，幸存的仍在城头同敌人肉搏。李天佑像一头雄狮向反击的敌人扑去，不幸却遭到背后敌人的射击，右手和背部3处负伤，伤势严重，从几丈高的城墙上摔下来，落在城墙下牺牲战士的尸体上昏了过去。当连里通信员在尸体堆里找到他时，以为他牺牲了，哭喊道：“连长！连长！”，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他背出阵地后，他苏醒了，立即被送到野战医院救治。这是他第四次负伤，年仅18岁。

李天佑受伤后，攻城战斗仍在进行，但由于大批敌人赶来增援，红三军团指挥部便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此役，红军伤亡3000余人，红4军红11师政委张赤男、红五军团红13军红37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师团干部英勇牺

牲。红三军团红 1 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

### 我替他打保票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派夏曦到湘鄂西。夏到湘鄂西之后，以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的名义，排斥了贺龙的领导。同时还组织了一个“肃反委员会”，对干部、战士任意强加“改组派”的罪名，予以逮捕、关押，以至杀害。

到 1932 年下半年，先后给红 9 师政治部几任主任当过警卫员的谭友林，因这几位主任均被指控为“改组派”，他也被打成了所谓的“改组派”。行军途中，他被特务连的战士牵着走，从巴东过长江后翻越野云关时，他衣不遮体，打着赤脚板，在大雪纷飞、地冻天寒的山路上攀登，痛苦不堪，步履极为艰难。肃反委员会准备杀了他，无奈手边没有杀人刀，又不敢打枪，怕暴露了目标。

第二天黎明时分，在山脚下遇到了正在路边检查后卫部队的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谭友林还是在打郝穴时跟贺军长见过一面，事隔一年有余了，这一年，部队转战河南、陕西、四川，进行了一次 7000 余里的小长征。“这不是谭伢么？”贺龙居然还认出了已是蓬头垢面、衣服褴褛、脚趾被磨得稀巴烂、骨瘦如柴几乎变了人形的谭友林。一声熟悉的呼叫，谭友林立时委屈地就哭出了声。

见谭友林这个样子，贺龙心里已明白了几分，故意大声而又生气地问：“你犯了啥子纪律？”

“他是‘改组派’”未等谭友林开口，负责押送的人抢先作了回答。

“他算么子‘改组派’哟！他知道么子叫个‘改组派’么！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 19 岁的娃儿，连父母都没有了的孤娃！”贺龙越说越火，气愤得连声音都有点变了。这时关向应政委，在旁边也说了话：“是啊，他在军部当油印员时是模范团员。鲁易（红 9 师政治部主任）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他的领导还不愿意放哩！”

听到这里，贺龙已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怒气，对身边的人吼道：“马上把肃反委员叫来！”肃反委员过来后，贺龙厉声命令：“快把谭伢给放掉，我替他打保票！”

贺龙虽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但他那威严的命令，使那个“肃反委员”丝毫不敢怠慢，立即给谭友林松了绑。

重见天日的谭友林，无限感激贺龙军长，贺军长又派人牵马，把谭友林送到鹤峰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伤愈后，贺军长托人把谭友林接到桑植过年，并将他留在军部，仍当油印员。

后来，谭友林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贺龙同志曾经营救了我，还有那许许多多无辜的同志。我们对他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的大无畏精神，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 柳直荀殉难湘鄂西

毛主席的一首精美绝伦、极为动人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不仅

脍炙人口，广为人民喜爱和传唱，同时，人们也深深被一代伟人与烈士遗孀、一位普通女教师极富传统风采和浓厚人情味的崇高情谊所折服、倾倒。毛主席怀友诗词之作不多，人们在读这首惊天地、泣鬼神、情殷殷、意切切地歌颂夫妻情、战友情、革命情的词作中，缅怀和祭奠英烈，自我的精神和灵魂也像得到了升华和净化。

诗词中的李淑一安在？柳直荀同志后人又如何了？这些都是大家关心惦念的。春暖花开柳树飞絮之际，笔者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居民大院里，采访了李淑一老人和现已从国家经委离休的柳直荀烈士之子柳晓昂同志。

闻名于世的李淑一老人已95岁高龄，真可谓老寿星矣，由于年事已高，她只能坐在轮椅上听我们谈话。柳晓昂同志也早已是耳顺之人，69岁了。他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虽然离开湖南50年了，但仍带着朗朗的湘音，坚实而又洪亮。

笔者向两位老人说明来意：社会上对柳直荀同志的牺牲曾流传过种种说法，过去当笔者陡然闻听柳直荀烈士并非是在洪湖战役中与反动派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而是被革命队伍内部的“自己人”、当时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夏曦残酷加害的时候，简直不敢、也不愿相信此讯。因为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刊物明明白白登载毛主席诗词时，所用的背景材料介绍都是称他在洪湖战役中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历史上人世间，兄弟阋墙有之、同室操戈有之，但无论如何不愿让嫦娥“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动人形象，再次被“左毒”所侵害，且令革命领袖毛主席痛切感叹以至“泪飞顿作倾盆雨”！其内幕竟是这样令人心碎、这样残酷无情。这次采访就是希望作为柳直荀烈士的亲属，能有个权威的历史的说明，不仅可以告慰英烈在天之灵，也不枉对子孙后人，这样才能向广大读者澄清历史事实，也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作词答李淑一那万千的心境。

柳晓昂老人爽快地答应了笔者的要求，并找出了许多历史资料，与笔者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

柳直荀“走”了以后，家里人很关心他到底是怎么“走”的。1933年到处传闻他牺牲了，李淑一为此还写了一首《菩萨蛮》的词，词的内容是这样：  
《菩萨蛮》惊梦兰国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这首词就是1957年李淑一寄信给毛主席同时附上的那首。但当时到底死没死也搞不清楚。解放后，曾写信给谢老（谢觉哉）问及此事。大约是1956年，谢老回了信，李淑一当时把信交给了湖南省的民政部门，因为是作为烈士的证明，拿走前还拍了个照片。后来知道谢老在1945年1月9日日记中曾有如下的回忆：“我认识直荀同志是在湖南省农民协会——高高的个子，夹一皮包，不多说话，任何事问他，都能给你满意回答。……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看到他，说是从南阳邓宝珊的部队里回来。在上海也看到过他。1932年又看到他在湘鄂西省当财政部长。办事扎实、态度诚恳，和以前一样。一天，忽不见了，初疑其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被捕原因未及宣布，而苏区失败。直荀同志及其他很多同志都从此不知下落。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教会教育的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遂贡献一切于共产主义事业，其不会有任何反革命活动，是可以其品质保证的。”但谢老这次回信的原文是这样：

淑一同志：

来书诵悉，直荀同志牺牲地点是沔阳或监利；牺牲时间是 1932 年的 9 月。当时他是湘鄂西省苏维埃的财政部长。

那是最艰苦的年月：战争不断，给养困难，没有菜吃，直荀便吃点泡菜，部里人说：“他出发了”。财政部长下乡筹粮是常事，我们的地区很有限，出发不会远，因此我没问他出发到什么地方。

省苏（维埃）驻地在搬迁，所谓搬迁，是包袱、锅盖、碗盏、粮食、小划子，半点钟内连老百姓一起可以全部走完。不久知道直荀同志牺牲了。时我们已被迫藏进菱草湖里（菱草湖不是地名，是长了一二丈多深的菱草，我们日里把小船藏在菱草里，夜里出来活动），无法知道详细。知直荀同志牺牲时在一起的人现已找不到一个了，因而也无从追问。

估计直荀同志是在战斗中死的，因为那里有队伍在抵抗。洪湖的战斗队伍，虽然失败了，但没有一个束手就缚或投降的。

我和直荀同志相处过一个时期，熟悉他的品质，他是个“临难不苟免”的人。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胡虏平了，良人不还，然而良人的不朽业绩，永远记在史册上，记在人民的心上。至望你善自宽慰。

敬礼

谢觉哉

4月26日

当时谢老是湘鄂区苏维埃财政部长，李淑一一家也就一直这么认为了。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报介绍说柳直荀是被党内自己人杀害的，与谢老讲的不符，柳晓昂就和母亲一起，拿着信，专门去找了谢老一次。

谢老听柳晓昂说明了来意，还没有开始讲话就已眼泪汪汪了，说：“红卫兵报纸讲的情况确实是真的，柳直荀是在路线斗争中被执行‘左倾’路线的夏曦杀害的，当时我已被国民党军统抓了，否则也会被杀了。”

柳晓昂说：“红卫兵小报为攻击贺龙说是贺龙干的。”

谢老说：“贺龙虽是三人肃反小组的，实际上贺龙管不了事，贺龙主要是管军事，实际是夏曦管。”

但是谢老没具体讲是怎么牺牲的，因那时他已被捕，早离开了，不清楚这个事。“七大”召开以前，中央有个组织工作会议，那个会议是清算王明路线以后，对于错杀错整的要平反，至少是材料很多，“七大”会议也谈到这个问题。谢老也是参加了“七大”的，谢老用手比划着说：“有这么厚一本小册子，都是记载着那些同志被杀害后的平反证明材料。会议开完之后，这些材料作为大会的机密，全部收回去了。这些同志被杀，把他们作为烈士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材料也收回去了。”

后来，毛主席逝世以后，《解放军报》有人访问柳晓昂，要写个柳直荀生平传记。当时柳晓昂手里有些材料，但很杂乱，难写出来。于是，这位《解放军报》的记者与他的一个抗美援朝时的战友，向天津市委申请了 2000 元经费，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跑了好多省，找了好几十个人，终于把柳直荀的情况搞清楚了。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柳直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到上海、天津、湖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 年任中央军委特派员，参加组织过渭华暴动，1929 年冬，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 年夏天到洪湖根据地，先后担任红 6 军政治委员、红 2 军团政治部主任、红 3 军



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等职。1932年3月，柳直荀回到监利县周老嘴，此时，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已中止一个多月了。当他了解到党代会上夏曦竭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把“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规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在军事上，又强迫红军打城市攻坚战、堡垒战、阵地战、大规模的平地战，更要进攻武汉等大城市，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倾向”；在策略上，夏曦坚持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消灭富农，侵犯中农利益。这一切遭到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并要求撤掉夏曦的领导职务。万涛、段德昌、彭国才等许多同志，在大会上都作了批判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发言。使夏曦的错误提案无法通过，以致不得不宣布休会，夏曦派人专程到上海向王明搬“救兵”，企图以上压下。

柳直荀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旗帜鲜明地站在贺龙、万涛、段德昌等同志一边。他认为只有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左”的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才不会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

不久，王明路线的中央派来代表，完全支持夏曦，只是不同意撤销红3军军事领导机关，并宣布万涛等人为“反党集团”。同时指示中央分局，对那些不同意、不执行王明路线的人予以“残酷的斗争”，使王明路线在湘鄂西得到进一步贯彻。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红25师到潜江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以后又与洪湖独立团合编为红8师，柳直荀被任命为师政委。当他奉命赶到潜江后，许多曾经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指挥员都不见了。他向战士们仔细询问，才得知是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来的人，硬说鄂西北独立团里混入了许多反革命，当部队开到潜江的当天晚上，就把部队突然紧紧包围起来，一下子逮捕了大批连以上的干部，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柳直荀的心。他赶到周老嘴，找分局政治保卫局辩论，质问夏曦。然而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丝毫不听劝告，反而认定柳直荀也是个“危险分子”。

夏曦抓住战斗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首先逮捕了红8师参谋长胡慎已和政治部主任潘克鲁。把胡、潘二人因工作而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党员干部名单，全诬蔑是“国民党改组派”而加以逮捕。又来追查与名单上的人有过来往、吃过饭、抽过烟，甚至在一起说过话的人。此时，夏曦利用权力先撤销柳直荀在红军的一切职务，随后，又给柳直荀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夏曦说红3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是柳直荀施展的“抛弃洪湖根据地的阴谋”。后来红3军及25师回洪湖又是柳直荀等人“抛弃房县苏区的阴谋”。还诬蔑柳直荀、万涛、潘克鲁等人是“国民党改组派”，书记是“柳克明”（柳直荀）。1932年5月，蒋介石已开始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仅湘鄂西就投入了10万以上的兵力。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夏曦却还在搞所谓“火线肃反”。

由于夏曦不接受贺龙“跳入敌后，从外线打击敌人”的建议，而采取“分兵把守、两个拳头打人”的策略，使红3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希望，不得不仓促突围。

在突围前，夏曦背着贺龙等领导同志，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将被关押的干部全部杀掉。1932年8月30日，在湖北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柳直荀和其他20多人一起被五花大绑、眼睛蒙上黑布，在枪口和砍刀下悲愤地倒下。

临刑前柳直荀只说：“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妻子，告诉她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柳直荀殉难时年仅 34 岁，李淑一 31 岁。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清算了王明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全党的严重危害。党中央给柳直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

为纪念柳直荀蒙难，李淑一于 1978 年看了白桦写的话剧《曙光》之后，写了一首七言长律：

革命江山碧血诗，《曙光》启示耐寻思。  
三军赤旗东风展，鱼米洪湖雨露滋。  
横祸哪知从内起，英雄蒙难入囹圄。  
可怜江畔芦边骨，犹在亲人梦里驰。  
延安明断昭青史，千古讴歌颂导师。

为缅怀先烈、启迪后人，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民政拨款，周老嘴人民政府营造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1979 年 9 月破土动工，1980 年 3 月落成。纪念亭坐落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周老嘴心慈庵。

李淑一还为纪念亭内的纪念碑写了碑文：

八载相知久，桃园常入梦，夜夜泪沾襟。含辛遵夙愿，忧患抚孤成。四九平胡虏，家国沐春风。一阕《蝶恋花》，主席寄深情。昔日长桥柳，早是伏虎人，为民求解放，紧跟毛泽东。百折志不馁，生死何足论。抵日驱张毒，湘上召工农。“八一”举义旗，洪湖佐贺龙。极左败大业，遗骨楚江滨，临难不苟免，身亡浩气存。翘首望月宫，依依杨柳青。周老建亭碑，属余作记铭。华颠遥祝愿，后起作干城。团结戒自戕，江山血铸成。安定奔“四化”，酬志慰忠魂。他年庆功日，毋忘播火人。

每逢清明扫墓、中秋节凭吊都有很多人祭奠，现在亭园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告别了两位老人回来，一路见青青柳丝随风摇曳，黄鹏飞鸣穿行其间，一曲《蝶恋花》又一次回响在耳际，哦！九霄云上杨柳两君尽可安心游仙了。

## 许世友摔跤

曾在少林寺学过武功的许世友，不但自己常习武练功，而且十分注重部队的打拳劈刀训练，闲时也常爱和战友们切磋武艺。

早在 1932 年，时任红 12 师 34 团团长的许世友曾和战友“交过手”。一天，他先叫战士们一个班一个班地比武打拳劈刀，然后又让他们对练，如发现哪个战士动作不准确，就当场指点并亲自示范。战士们生龙活虎，练得十分认真。许世友看在眼里，乐在心中，说：“对，就这样，敌人打你，你也打敌人，只有练好本领才能保卫自己。不要小瞧这打拳劈刀，它能对付敌人的‘花枪’”。说完，许世友朝前面的战士看了看，指着一个腰圆膀大的战士笑着说：“来，咱俩摔一跤”，“不行，不行！”见团长要与自己摔跤，这位战士有些害怕，一面退后一面摆手推辞。“怎么？没交手就认输了？这可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作风哟。”许世友用话一激，这位战士果然鼓起了勇气，只见他双手交替，唰唰几下把衣袖挽起，又紧了紧腰带，像一个真正的

运动员似地走了上来，一个饿虎扑食，猛地抱住了许世友的一条腿，拼力向前搬去，可搬呀搬，直累得满头大汗，许世友的腿犹如一根钉在地上的铁柱子，就是搬不动。“撒手吧，功夫不是一天练的。”许世友话音刚落，“腾”的一声被那位战士一掀，来了个仰面朝天。许世友连忙站起来，笑呵呵地说：“哈哈，好样的，你还真会偷袭。”看到团长那个乐劲，在场的战士们也都乐了。

习武强身，打拳劈刀，的确是不能小瞧，正因为许世友有这一身的功夫，在战争年代里多次助他逢凶化吉，他曾7次参加与领导“敢死队”，8次负重伤而脱险。

1934年，许世友虽已担任了红军的副军长，但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冲杀精神丝毫未减。一次，他率部执行阻击任务，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残酷，数倍于红军的敌人，一批接一批地朝红军坚守的山头发起疯狂进攻。在敌群之中，许世友发现一个举着美式左轮手枪的敌军官，带领敌“督战队”逼着士兵往上冲，许世友暗想，这个“督战队”军官是个大祸根，必须先把他干掉。主意已定，待敌人又一次进攻逼近阵地时，许世友大喊一声“打！”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许世友见出击的时候已到，“唰”地从背上抽出特制的龟头大刀，借着弹雾飞身冲出指挥所，大喊一声“杀啊！”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同敌人杀到一处，展开了肉搏战。在一片混乱的杀声和刀枪的撞击声中，许世友舞着大刀，上下翻飞，左劈右杀直逼敌“督战队”军官而去。到了近前，许世友举刀便劈。可是，突然从斜侧冲过来两个敌兵用刺刀把他的大刀架住了，许世友立时怒起，挥舞大刀，一连使出“海底捞月”、“夜叉探海”两个招数，瞬间将两个敌兵砍死。随后，他提刀便去杀那个“督战队”军官。敌军官早已被他的大刀吓破了胆，此时已爬过壕沟，正狼狈地拼命往山下奔逃。

“哪里去！”许世友大喊一声，随之飞身逼近敌军官，但见刀光闪过，敌军官的身首已分了家。更令人叹服的是，由于许世友刀功娴熟到了“飞花摘叶”的程度，致使那个敌军官的脑袋虽然已离身滚到了山下几米开外，可他的无头之躯竟继续向前走了十几步才倒下来。一场惊天动地的肉搏战之后，石头缝里都滴着鲜血，敌人狼狈地抛下一部分尸体败下阵去。

此时，许世友凝视着手中的大刀愣神了，一把纯钢的大刀，竟然砍得卷了刀刃了。

## 翻越风雪大巴山

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转战，翻过秦岭，涉过汉水，来到大巴山脚下，已是1932年的隆冬腊月。在这个偏僻的大山区，人们听说来了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乡亲们便扶老携幼，敲锣打鼓，欢迎红军，也想看看红军长得究竟怎么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耐。

吃晚饭的时候，红军指战员们边吃边热烈议论着。

有的说：吃得饱饱的，准备足力气，明天和大巴山比试比试。

有的说：山高没关系，它总不会比敌人的百万大军厉害吧。

一位老大爷听着战士们的议论，一边试探着问：你们过大巴山是真的吗？

一位红军战士说，那还能有假！

老大爷听了，摇摇头，叹口气说，不容易呀！如今大雪封山，你们想过

山，除非有腾云驾雾的本领。你们可知道这大巴山不比寻常的山，上山七十（35公里），顶七十，下山七十，这三七就是210里，你们一天走得完吗？要是走不完，住在山上，没有一户人家，你们这身单衣，冻也得把人冻死。依我看，你们不妨先住下，等来年开春再过山更稳妥！

乡亲们是一片好心，他们不知道敌人的追兵将至，红军是不能在这里久留的。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们就向大巴山进发了。指战员们有的披着棕榈皮编成的蓑衣，有的披着棕皮，腰间扎根草绳。脚上用稻草、棕榈皮和麻绳包扎着。上级还命令每人带一捆稻草。有的人不理解，问指挥员背这稻草干什么。指挥员解释说，现在背嫌累赘，到了山顶可就是好东西了，白天是棉衣，晚上是棉被，路滑时还可作脚码。

就这样，这支队伍冒着雪花，向大巴山进军了。大家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向山顶移动。整个山上山下，像一条白龙似地伸向山顶。不久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家不知是什么声音，听了许久，才发现冻结在每个人身上的小冰棒，经风一吹，发出的响声，冰块越结越大，越走越吃力，指战员们不时用棍子敲打一下，以减轻负担。红军以坚强的毅力，攀登过一座座峭壁悬崖，过了一坳又一坳，越到山顶，越感到寒冷异常，腰酸腿痛，呼吸也越感困难。

到山顶，又是狂风大作，雪花变成冰雹，打得不少同志鼻青脸肿。人们身上的汗水结成了冰块，手早已冻麻木了，吹出的气也是冷的。这时，先头部队已到山顶，宣传队员们在居高临下开动宣传机器，他们顶着风，吃力地喊着：同志们，加把劲，眼有就是宿营地。坚持最后几分钟，马上就到山顶峰。大家呼喊，互相鼓励着。

晚上在山顶宿营，大家利用稻草，找个避风处，互相挤在一起，铺和盖的都是稻草，就这样睡觉。每人吃着自己带的干粮，没有热水，越吃越凉。

次日天明，队伍继续前进，走完山顶七十，开始下山，有了老百姓，指战员们能够烧一点热水喝了。山那边的群众见到这支满身白色冰甲的队伍，都伸出大拇指，赞叹不已。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征服了风雪大巴山，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 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是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福建开展的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实际上是进一步打击毛泽东，打击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以便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地方“专做政府工作”，实际剥夺了他的军权。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苏区后，博古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实行的政策，他们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

红军的领导岗位，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倾政策的人进行排斥和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搞宗派主义。

1月21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在新泉就长汀、连城、新泉等地的工作方针问题，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应先打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战斗力。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

这时，博古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福建上杭，指责前来迎接的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为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职务。

接着，中共临时中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江西。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起因，是“寻乌事件”。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广东军阀部队向苏区南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以游击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强调扩大红军，把会、寻、安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第3师离开筠门岭，前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的武装力量，造成了防御兵力空虚。1932年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方武装孤立无援，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粤军占领。

这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他们却抓住这个“寻乌事件”不放，诬陷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从此，拉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1933年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31日，会议通过《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会后，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由于邓、毛、谢、古不服，并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他们遭受到更大打击和围攻，部分或全部被撤销职务，还当众被缴了枪，下到基层去改造。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了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

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路线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伤害了大批同志，给苏区和红军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 “红色娘子军”的悲壮结局

提起“红色娘子军”，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电影《红色娘子军》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但是，“红色娘子军”连的结局如何？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色娘子军”连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3月26日的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当时，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苏区不断扩大，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琼崖妇女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发挥琼崖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采取三三建制，编制归红3团。消息传开后，苏区的妇女奔走相告，立即有数百名青年妇女报名，后经严格挑选审查，批准一百名女青年参军。

5月1日，“女子军特务连”成立的那天，当火红的太阳染红了大地的時候，乐会县苏维埃政府的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广场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大会”的横幅，会场四周挂满了鲜艳的彩旗，主席台正中挂着镰刀斧头红旗。前来参加大会的有赤卫队，少年先锋队 and 劳动童子团，以及苏区群众共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治委员郑大礼特地赶来出席大会，独立师第3团团长王天俊、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傅良清也参加了大会。

上午8时许，当傅良清主席宣告大会开始后，身着崭新军装、佩带着红袖标、全副武装的女子军特务连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列队在主席台前时，会场上群情鼎沸，欢呼声、赞美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响彻云霄。

在一片欢呼声中，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走上主席台，庄严地从师首长手中接过连旗，鲜红的连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党代表王时香代表全连女战士表示决心。然后，全连指战员面对军旗举手宣誓：“坚决服从命令，为革命奋战到底！”最后，特务连的女战士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接受了师首长的检阅。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使她名声大噪。

那是6月的一天，乐万地区“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带着数百名国民党地方军占领中原市，向苏区革命根据地“进剿”。

红3团得到消息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予以围歼的战术。

16日，红3团大张声势地离开乐会苏区，向万宁县城挺进。当日夜晚，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埋伏在中原通往乐会苏区的必经之路——沙帽岭的峡谷山林。

果然，陈贵苑上当了。他错误地估计红军主力到万宁，根据地仅剩女子军特务连防守，可以乘虚而入。6月17日，陈贵苑亲自带领几百人，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向县委和苏维埃机关驻地发起进攻。当敌人进入沙帽岭后，首先就与女子军特务连遭遇，女子军特务连按照部署，与敌人稍一接触，便假装败退，将敌人向预设阵地引去。陈贵苑一看女子军特务连不是自己的“对手”，更加得意忘形，一边狂叫：“都是娘儿们，谁抓到就赏给谁做老婆。”

一边指挥敌兵蜂拥而上。敌人渐渐地进入红3团的伏击圈后，军号吹响，杀声震天，枪声、爆炸声震撼山谷。敌人遭到猛烈袭击，顿时乱了阵脚，丢下遍地的尸体，慌忙逃窜。另一路敌军听到沙帽岭的枪声、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情知形势不妙，但又害怕送命不敢前来救援，只好收兵龟缩回据点。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共毙敌100余人，俘获陈贵苑以下70余人，缴枪146支，子弹1000余发。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从此，女子军特务连的英名传遍琼岛，被人们赞誉为“红色娘子军”。

随着女子军特务连声威大振，苏区的妇女更加羡慕娘子军，纷纷要求加入女子军特务连。于是，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女子军特务连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在红军独立师师部担任警卫任务，归红1团建制；抽出一个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女子军特务连第2连，归红3团建制。红1连连长为冯增敏，指导员仍是王时香；红2连连长是黄墩莫，指导员为庞学莲。

1932年8月初，广东军阀陈济堂派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带领其所属部队和空军一个分队“围剿”琼崖红军。

面对敌人向琼东乐会苏区的大举进攻，特委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苏区斗争外，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独立师师部由女子军特务连及警卫部队掩护，向母瑞山地区撤退转移。

当大部队撤至定安牛鞍岭时，敌人追了上来，女子军特务连和红1营继续留下阻击敌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仗打得非常艰苦。女子军特务连和红1营完成阻击任务后，女子军特务连又把第2班留下负责掩护阻击部队撤退。结果，全班战士在弹药打尽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琼崖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后，敌人又步步为营，紧追不舍。在飞机的配合下，展开大肆“围剿”。在反“围剿”的作战中，红军损失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特委和独立师首长决定部分红军进行突围，向乐会四区根据地转移。女子军特务连的部分战士突破敌人的围堵后，在乐会四区的沙帽村与女子军特务连红2连会合。不久，敌人大部队又对乐会四区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突袭，红军损失惨重。为了使革命的火种保留下来，特委再次决定将红军余部和机关化整为零，分散各地隐蔽斗争。从此，琼崖革命走入低潮。女子军特务连也随之而解体。

女子军特务连虽然不存在了，但分散在各地的女战士们仍然坚持战斗，继续在各个战场上英勇杀敌，直至琼崖解放。

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的辉煌战斗历程，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这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完整、纪律严明、斗争英勇的“红色娘子军”，却是举世无双的，她为唤醒琼崖妇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为琼崖的解放事业，留下了传世美名。

### 党的第一支妇女独立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进入四川北部，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大部地区，歼灭敌军3个团，击溃敌军8个团，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

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成立川陕

省委，选举袁克敏为书记。大会通过了《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等几项重要决定。鉴于当时的形势，判断敌人新的围攻很快就会到来，扩大红军，壮大力量，准备粉碎敌人围攻的工作刻不容缓。

扩大红军力量的形式很多，有的是直接参加红军，组织一部分人员进入党校学习，以培养骨干，还成立了川陕青年团临时青委、工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这时，敌人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部署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川军各派暂时停止了军阀混战，共同对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下令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促其趁红军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攻，还特别拨给100万发子弹，20万元军费。田颂尧调集38个团约6万人的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进攻。

红四方面军总部分析了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依靠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有利条件，依托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即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打破敌人围攻。

红军指战员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和正确的战法，从2月中旬战至3月中旬，杀伤敌人8000多人。敌军士气锐减，攻势变弱，战局呈现对峙状态。敌军加紧搜刮民力民财，准备新的进攻。

红军和根据地群众也总结了前一阶段作战经验，开展战场练兵，深入动员，瓦解敌军。同时动员根据地群众参军参战，筹集粮秣。

根据地群众参军热情十分高涨，为了增强前线作战部队的力量，后方警卫分队全部调去参战。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决定，为加强机关和后方警卫力量，编成妇女独立营。以通江城内各机关的妇女百余人为基础，又吸收200多名妇女群众中的青年积极分子，约400人，编为3个连，由陶万荣任营长，曾广澜任政治委员，秦基伟为军事教官。这个营直属总部领导。

妇女独立营成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还担任负责警卫后方机关、通信、运输、剿匪等任务。

在反“三路围攻”战斗中，17岁的营长陶万荣指挥全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担任在通江城外的鹰龙山阻击敌人，尔后配合红十师、红11师向刘存厚部反击，消灭敌1个团的残部，这一仗妇女独立营打得漂亮，受到总部的表扬。

鉴于妇女独立营的作用功不可没，加上红军“收紧阵地”时边沿区大批妇女撤退到中心区，她们决心武装保卫政权。中共川陕省委根据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加上边沿区来的妇女干部，扩编成妇女独立团。1934年3月扩编完毕，下辖3个营，由曾广澜任团长。这个团经过短期训练，担负起艰苦的战勤工作和后方机关的警卫、清剿土匪等任务。在敌人进攻旺苍坝时，她们在两天内把囤积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军火、棉衣和食盐，向后方转运30多公里。为了保证前线供应，女战士们常常身背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物资，爬山涉水，送上阵地。回来时又抬伤员到后方医院治疗。她们这种艰苦无畏的精神，优良的革命品质，在妇女发展史上和川陕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以后这个团由于工作出色，反“六路围攻”后，方面军总部决定健全机构，充实连队，组织建制又进行了调整，各军都缩编1个团到1个师，妇女独立团保留原建制。



妇女独立团随方面军总部转战在川西北，与中央红军会师，参加了长征，后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三次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再次整编，妇女独立团已由执行战勤任务为主转到执行艰巨的战斗任务，由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爱人张琴秋任团长。参加了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又参加西路军，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下，英勇奋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在祁连山区失败。

### 十三岁的妇女部长

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中有一个小姑娘，带领一个连的妇女指战员，抬担架，送粮食，有时还直接参加战斗，她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指战员们都听她的指挥，她，叫刘春，时年15岁。了解情况的人都说，别看她年纪小，可她13岁就当县的少共妇女部长。

13岁怎么就当上部长的呢？刘春是四川省宣汉县双河场李家湾人。家境贫寒，7岁那年就给地主刘文统家当丫头。

她12岁那年，红军进入川陕地区。她早就听说红军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一天她到双河场赶集。一位女同志身背马刀，打着绑腿，步伐矫健。她仔细一看，原来是宣汉县马渡关柏垭子村的朱雪英。刘春心想，朱雪英参加了红军，多威风。于是一把拉住朱雪英说，我要跟你走，参加红军去。

朱雪英说，你还是个小鬼呢。

刘春说，你不也是一个小鬼吗？

朱雪英听了笑嘻嘻地说，那好，你就在这等着。说完她就走了。她回来后，对刘春说，你先回到李家湾去，当童子军的队长。

刘春带着童子团的20多个小伙伴，打土豪，斗地主，给红军站岗放哨，搞得很红火。

不久，经朱雪英介绍，刘春正式参加了红军，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通江县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刘春在朱雪英的帮助下，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主要是：穷人为什么没有土地种，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地主的土地、吃的、穿的、用的是从哪里来的。朱毛红军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怎样领导穷人翻身搞革命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讲得井井有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3年3月，刘春所在的红军部队进驻通江县城，县少共妇女部正式成立。县里几位领导叫刘春当妇女部长。她说，我不识字，什么都不懂，怎么当部长。县几位领导说，就是要你这样的人当，不会可以学嘛！就这样13岁的刘春当上了通江县少共妇女部部长。她带领10多名同志搞宣传，扩大红军，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很出色。

1934年反围攻战斗紧张地进行，要派一部分人向大面山作战部队送粮。刘春带头要去，县妇女部长冯开兰说，不行，你一个女娃娃，个子又小。小刘春坚持要去。

正当她准备出发时，上级通知她到省苏维埃去学习。一是学文化，二是学军事斗争史。学习一个月后，回到部队担任妇女独立团第2连连长。长征到达川西北后，她们连送粮，战地救护很出色。到达甘孜时，毛泽东同志还去看望了她们。

## 决不做你的狗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在新集附近的胡山寨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右腿负了重伤。其后又随部队越过平汉路西进，因伤势太重，组织决定他去上海就医。

几个月后，腿伤好了。他正准备离开上海，不料于1933年3月24日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关押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里。当时，与他先后被关押在一起的还有罗登贤、廖承志等人。因为不少人都认识陈赓，所以他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向难友和看守大讲红军故事。敌人派人来劝他“悔过”，他就破口大骂，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就缄口不言。敌人审讯他，他却在法庭上与罗登贤、廖承志等大唱国际歌。弄得敌人十分狼狈。

几天后，他被用铁甲车押送南京。为防止他途中逃跑，把他和另一个被抓来的女学生连锁在一起。到南京后，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去迎接陈赓，给以“优待”。之后，许多已担任国民党高级军职的黄埔军校同学不断来“看望”他，劝诱他，他只报以轻蔑的目光。

在南京审不出结果，于是，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有点坐不住了，决定亲自要召见陈赓。一方面蒋介石深知陈赓是个难得的将才；另一方面，陈赓在东征时曾冒险救过他的命。

这位受到蒋介石特别关照的“囚徒”确实难以对付，除了熟睡的时间外，他几乎没有一刻的安静，即使眼前只有几个看守，他也不停地宣传红军，宣传革命。好像他根本不是一名囚徒，而是一位启蒙老师，一位演说家。

蒋介石到南京后，摆出一副黄埔军校校长的架势，对这位曾经“救驾”的学生也表示出特别的宽宥和关怀，好言相劝。

“你不要逢场作戏了，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我都看透了，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陈赓大义凛然，态度依然如旧。本以为这种“最高的”接见定会使陈赓感化就范，岂料，陈赓斩钉截铁地回答，弄得蒋介石既不能接受，又不好发作，大为尴尬。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我看你还是当年咱们共事时的脾气。今天谈点别的，谈点别的……”蒋介石虽强装镇静，但还是难以掩饰他那十分难堪的窘态。

过了一会，蒋介石见陈赓不语，又装着很关心的样子劝说起来：“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些。”说罢，看着陈赓身上穿的旧衣服，继续劝道：“你是个大将军，还穿满身虱子的衣服，这多不体面啊！”

“我陈赓天生和虱子有缘分。虱子是革命虫！”陈赓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蒋介石见陈赓不买他的帐，便更加露骨地摊起牌来：“只要你肯过来，愿意带兵，马上给你个师长，就是给你个军长，也是我一句话。不愿意带兵嘛，也好。我可以给你个特务总队长干，只要你答应同我合作，这些都由你挑。”

听到这里，陈赓心中的怒火再也难以遏制了，霍地站起来，愤然打断蒋介石的话：“我一进来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陈赓是中国共产党员，决不做你的狗官，你想让我叛变革命，哼！你打错了算盘。”

此时，蒋介石已黔驴技穷，暴跳如雷地让卫兵将陈赓押回了监狱。

不久，蒋介石一面迫于舆论上的压力；一面幻想通过对陈赓的宽大而影响红军的黄埔学生，答应释放他，让他住在一家旅馆里，后来，陈赓便在地下党组织的接应下乘隙逃出。

这次铁窗生活历时两个多月，在他那丰富的阅历中，又增加了一段曲折，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的佳话，这年他正好 30 岁。

### 革命队伍就是你的家

1933 年 1 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 4 个师。时任红 4 军政治委员的罗瑞卿被调到军团任保卫局长。整编还未完成，第四次反“围剿”就开始了，直到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罗瑞卿才赴军团保卫局任职。

根据工作需要，到军团部以后，组织上抽调了一名姓龙的战士给罗瑞卿同志当警卫员。小龙平时也见过罗瑞卿，但刚到首长身边难免还是特别的拘束。罗瑞卿见小龙拘谨地进了办公室，马上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微笑着招呼他：“小鬼，来，坐下。”罗瑞卿边让凳子边问：“今年多大了？”“报告首长！16 岁。”罗瑞卿见他仍很拘谨，就说：“别客气，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接着，又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当谈到小龙的爸爸、妈妈都已经死了，家里又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小龙难过地低着头，眼泪在眼里打转。罗瑞卿深情地看着他沉思了良久，然后和蔼地说：“革命队伍就是你的家，同志们都是你的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好吗？”小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断地点头，这时已激动得滚下眼泪了。

长征开始后，罗瑞卿一直注意关心和爱护这个失去父母的小战士。一次，小龙的脚被树枝划破感染了，肿得很厉害，可部队行军每天又要走很多的路，罗瑞卿就让他骑自己的马，小龙执意不肯，结果罗瑞卿不由分说，硬是把他扶上了马。部队宿营时，罗瑞卿又找来一把盐，让他用盐水洗伤口。由于罗瑞卿细心的照顾和关心，小龙的脚伤很快就痊愈了。

罗瑞卿关心战士，爱兵如子的模范行动，被部队传为佳话。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们的热情，增进了同志间的团结。

### 神炮手赵章成

我军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使用迫击炮进行简便射击，有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本领。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中，他用 3 发炮弹打掉敌人 3 个目标，被传为佳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志愿军干部和苏联顾问表演 82 迫击炮简便射击，指着一棵树枝，弹发枝断，令苏联顾问们惊叹不已。赵章成不仅是神炮手，他还是炮兵战术运用的专家。

那是 1933 年春季，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中，赵章成率领红一军团炮工营参加了一次伏击战，炮兵不仅打得准，而且战术非常高明。

炮工营当时有 3 个连，第 1 连和第 2 连是炮兵，装备有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迫击炮和 37 平射炮，第 3 连是工兵连。

全营参加了伏击战，炮兵第 1 连配属红 7 师和红 9 师，在小龙坪附近设伏，炮兵第 2 连和工兵连配属第 10 师和第 11 师，在大龙坪附近设伏。这一天天气阴沉，视度非常不好，几十米外都难以看清目标，给炮兵射击带来很

大困难。

9 时左右，小龙坪方向传来急促的枪声，这是红 9 师 1 个连和敌人先头部队打响，双方在争夺一个山头。红 9 师这个前哨连打了一阵就撤回来，敌人以为是小股游击队，仍然整理队伍，继续行进。当敌人大队人马进入伏击圈后，各处伏兵一齐出击，炮兵连按事先标定的诸元射击，敌人被打懵了，四散乱窜。

这时，突然一群骡子在步兵掩护下抢占大龙坪，观察发现这股敌人用的都是自动步枪，这一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于是赵章成命令炮兵连调整射向，向大龙坪猛轰。原来这正是敌第 25 师师部，遭到意外炮击，又陷入四面包围，伤亡很大，四散逃跑。敌指挥机关一垮，部队就更加混乱。

红 9 师胜券在握，赵章成又赶到第 11 师阵地，步兵已冲向大龙坪，2 个炮兵班在后山掩护。这时两翼窜出两股敌人，互相对打起来，赵章成趁此时机，令 2 个炮班迅速转移，不久，红 22 团 1 个排冲上来把敌人缴了械。

次日中午，军团部附近山上突然出现一股敌军，足有 500 余人。军团部跟前只有电台人员和炮兵第 2 连，一共 100 余人，情况非常紧张，不容多思考和研究，赵章成即令该连选拔 20 多名精壮战士，手持短枪、大刀和手榴弹，前去拦截敌人。敌人发现这支队伍后，误认为自己人，不仅没有开枪，而且主动打招呼，双方相距很近，因为力量过于悬殊，将错就错去歼灭敌人已不可能。于是他就带头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优待！不然我们一开炮，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军团部的炊事员、电台人员和其他勤杂人员也都一齐喊话。敌人本来陷入大包围中，在狭路上又遇见这么多红军，冲在前面的是一队杀气腾腾的勇士，吓破了胆的敌人把枪往泥土里一插就投降了，红军一枪未发，俘敌 500 多人。炮兵打冲锋的故事，在红军中传为美谈。

### 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

1933 年 4 月 26 日，《红色中华》第 73 期上发表了“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的文章。该文记述和表彰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主动把全部财产、设备和个人多年积累的药品，捐献给革命的光荣事迹。其实在这之前，傅连璋院长早就为革命积极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

早在 1927 年 9 月，南昌起义军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率领下，经过连续激战，转移到了福建汀州。当时，起义军减员很多、伤情严重，光随军行动的伤员病号就有 300 余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联合汀州的医务界人员，以其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合组医院”，抢救和医治起义军的伤病员，为起义部队恢复战斗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间，年纪较大的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因患急性肠胃病，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已处昏迷状态，但在傅连璋院长的精心医治下，病情很快好转，不久就痊愈了。年轻的营长陈赓在江西万城战斗中腿部受伤，由于天气炎热，加上行军途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护理，伤口化脓，被送到合组医院救治，医生经过诊断，决定截肢保命，才 20 岁出头的陈赓，听说要截去他的腿，无论如何不愿动手术，医生反复劝说都无效。一天，傅院长来劝陈赓，陈赓恳切地说：“傅医生，我的腿不能锯，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在战场不能没有腿！”“可是不截肢对你的生命有危险啊。”傅院长不无心疼地说。陈赓斩钉截铁

地说：“医生，我的生命就是战斗，不能战斗还要生命干什么！”说着眼里滚动着泪花。傅院长被陈赓那火热的话和急切的神情所感动，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医治他的腿。从此，傅院长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还把自己的新鲜牛奶让给陈赓喝，以增强他的抵抗能力。最后，终于保住了陈赓的腿，使他得以在疆场上继续驰骋。

1929年，红四军赴闽解放了汀州城，傅连璋的福音医院更是忙里忙外积极服务，除了帮助治疗红军伤病人员外，还主动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接种了预防天花的牛痘。

1932年秋，毛泽东积劳成疾，来到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疗养。傅连璋院长为使毛泽东早日康复，他每天都陪着散步登山。

1933年初，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将福音医院迁往江西瑞金，正式创立中央红色医院，任命傅连璋为院长。接到任命命令，傅连璋深为自己加入红军而兴奋不已，主动把福音医院的全部财产、设备和个人多年积累的药品，捐献给革命，并举家随迁。

## 红军英雄任志贞

任志贞，原名任海棠，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是陕北红军第一个女政治指导员，被当地人民群众称赞为巾帼英雄。她1914年生于革命家庭，父亲任广盛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安定北区党委书记，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同志几次来过任家，志贞受父辈革命思想的陶冶，自幼立定志向要跟共产党干革命，投身于解放穷苦人民的斗争洪流中。

1930年父亲牺牲后，当谢子长再度来到任家时，志贞满怀悲愤，坚定地提出了参加红军的要求。由于革命需要，她的愿望没有立即得以实现，但根据她的表现，党组织决定吸收她为中共党员，任党的地下交通员。从此，任志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的伟大征程。

她任地下交通员的公开身份是瓦窑堡女校的女学生。一次，在班里偶然听到国民党部队骑兵分队要去袭击红军的消息，感到事关红军安危，便设法找敌人骑兵闲聊，证实了这一情报的可靠性，便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使红军晋西游击队不仅免遭损失，而且还取得全歼敌人的一个骑兵排的胜利。志贞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党组织表扬。她决心不骄不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党组织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因此，除完成交通工作任务外，还在班里广交朋友，以扩大信息来源，了解社会动态。对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同学，积极宣传革命主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他们加入革命的行列。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山河沦陷，华北危急的情况下，她更加努力宣传抗日救国，经常以标语、口号为武器，动员民众，配合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

一天，志贞在瓦窑堡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家中书写好“抗日救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传单、标语后，趁夜深人静时贴到大街小巷。第二天，人民群众见到这些宣传品，惊喜万分，国民党军营长害怕红军入城，便如临大敌，严加戒备，日夜巡逻。为了扰乱敌人，晚上待敌人的巡逻队过去后，志贞就悄悄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贴标语。有一次，她路过敌人岗楼，听到里面有人说要摆宴席，便等到敌人喝得酒酣耳热之际，把标语贴到了岗楼下。

志贞神出鬼没的活动，搞得敌人寝食不安，十分惊恐。敌营长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叫嚷：“一定要查出贴标语的共产党分子！”但查来查去，毫无结果，只好拿岗楼站岗的士兵出气，把其中的一个班长打了20军棍，并对其手下人员严加训斥。

1932年，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它经常出没在安定县的山野丛林和村庄小镇之中，打土豪，除劣绅，安良顺，济贫困，深得劳苦大众的拥戴和支持。这时，安定县新任的刘述民县长，为人专横跋扈，心狠手辣。他为了向上爬，显政绩，便实行严刑峻法，苛捐杂税，逼得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当地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希冀红军游击队除掉这个“土皇帝”。

刘县长的小老婆曾是任志贞的同班同学，在一次闲谈中，她无意中说到刘述民要在正月二十三来瓦窑堡走亲戚，志贞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县委。这天，刘述民骑着高头大马，在护兵的保卫下，耀武扬威地从安定县城直奔瓦窑堡。谁知在半路上，便遭到红军游击队的埋伏，死于乱枪之下。当敌军闻讯赶到现场时，红军游击队早已踪迹全无，远走高飞。

敌人从一次次失败中，对任志贞产生了怀疑。他们先是盯梢、跟踪，接着进行搜捕。敌人的行动扑空后，便公开发出悬赏通缉令：抓住任志贞，赏大洋五百块。

敌人的通缉令贴遍了安定、陕北，女共产党员任志贞的名字，连同她的英雄事迹，也不胫而走；传遍了安定、陕北。

1933年，党组织考虑到任志贞的处境困难，决定派她到红军游击队，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1分队政治指导员。参加红军，同敌人进行真刀真枪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夙愿。现在，愿望实现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眉开眼笑。她成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位女红军，女干部。不久，她同分队长白德胜结了婚，成了革命的伴侣。

志贞参加了红军，想尽快学会打手枪，掌握杀敌本领。正好，德胜是个惯使双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她一边加紧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边见缝插针地向德胜学习射击技术。她很快练出了一手左右开弓的好枪法。夫妻俩志同道合，比翼齐飞，把分队工作搞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战士们都竖起大拇指夸他们是一对好领导，好夫妻。

这年秋天，敌人加紧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进攻，红军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在苏区开展游击活动外，以主力南下，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一分队主要在安定、横山、靖边三县边界地区活动。

接连几天，红一分队不断听到任家砭一带群众反映，恶霸地主刘干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还向敌人报告红军的动向，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群众背地里都叫他“刘恶棍”。为了保护群众，杀一儆百，红一分队决定由指导员任志贞带领几名战士立即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刘干棍。

一天晚上，任志贞带领两名战士从驻地出发，次日凌晨鸡叫时分赶到了刘干棍的住地刘家沟。他们一声不响地摸进了刘家大院，从被窝里拉出了刘干棍。刘见状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声呼喊饶命。志贞手持双枪，大声厉喝：“今天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粮，就要你的狗命！”说罢，双手扣动扳机，“叭！叭！”两声，结果了刘干棍的性命。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惊动了附近搜剿红军的敌人。敌人不明虚实，派出一个班朝刘家沟方向扑来。

对敌人这一招，志贞他们早有准备。处决刘干棍后，他们喝令刘家的人找出三身长袍短褂，各自打扮成财主家的公子哥模样，装束停当便迅速地向驻地回返。走出几里路后，天已大亮。他们刚翻上一个山岗，便与敌人一个班遭遇。敌班长忙问志贞他们是哪家的公子？志贞从容不迫地回答是李家沟李财主的二公子。可是敌人中有一个是刘干棍的“狗腿子”，他认识任志贞，她见瞒哄不过去，便当机立断，趁敌班长和大多数敌兵疏于戒备，决心收拾这伙敌人。她迅速向两个红军战士递了眼色，顺手从腰间拔出双枪，对准敌人大声断喝：“不准动！缴枪不杀！”两名战士手疾眼快，也将枪口对准了敌人。敌人虽众，但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毫无准备，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两名红军战士把敌人的枪栓和子弹全部卸下来，让敌兵背着空枪，排成一行，向着红军驻地行进。中午，志贞他们押着 10 来个俘虏喜笑颜开地回到了驻地。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志贞和两个战士各荣立大功一次。

安定县西区和北区间有个村庄叫田家坬，原属老游击区，党的群众基础好。后来，由于敌人的“清剿”，游击地区缩小，田家坬便成了赤区和白区交界地带。一天，志贞和白德胜带领分队进驻田家坬，晚上刚宿营不久，就得到紧急报告，村四周发现敌人。原来，敌人的密探发现了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便尾随到田家坬，待红军睡下，便跑到安定县城向国民党军报告。敌人遂出动一个连的兵力和百来名团丁连夜包围了田家坬。

志贞和白德胜一面派人继续侦察，一面决定突围。志贞认为，敌情严重，只有迅速隐蔽地从村西北的大沟内突出去比较易于成功，因为这里两侧是高地，易守难攻，敌人不会料到红军会从此处突围，定然疏于戒备。白德胜等人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全分队由本村入伍的一名士兵带路，在敌人发动进攻前，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大雨裂沟。惯于夜间行动的红军游击队，从敌人的眼皮下迅速穿了过去。红军行进到雨裂沟的尽头处，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只遇到一些团丁。这些团丁平时看到老百姓如狼似虎，打仗碰到红军好像老鼠见了猫。他们虚放了几枪，撒腿就跑，生怕丢掉小命。待敌人主力部队赶到时，红军游击队早已安然进入山区。

不久，红军游击队转至延川县的官庄，这里也是老游击区，志贞他们想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没过几天，侦察员们先后报告，在东面和南面 10 多里的地方发现从延川来的敌人，北面 10 多里的地方发现有从安定方向来的敌人。这种情况表明，两县敌人串通一气，共同出兵，前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志贞和白德胜决定夜间向西南方向突围。

夜半更深，万籁俱寂，红军游击队悄然离开官庄，沿着羊肠小道向西南方向转移。天明时，红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不料却与正在前进中的一股敌人遭遇。

敌人凭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轮番向红军展开猛烈攻击。志贞等指挥红军战士抢占一个小山包，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虽然敌人在阵地前留下了 10 多具尸体，但红军也有伤亡。志贞认为，大白天同敌人硬拼，对红军非常不利，必须迅速占领附近的玉盘山，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到天黑再设法突围。这时她发现敌人正在向玉盘山迂回。她来不及同白德胜商量，便大声对白队长说：“你带一、二小队就地坚持，适机撤退，我带三小队夺占玉盘山，掩护你们！”说罢，带三小队向玉盘山冲去。

红军先敌夺占了玉盘山制高点，一阵排枪和手榴弹，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在三小队的掩护下，其他两个小队亦边打边撤，上了玉盘山，

全分队又合兵一处。玉盘山回旋余地大，易守难攻。敌人屡攻不下，便停止进攻，收拢部队，封锁了玉盘山的道路隘口，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老林。

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但由于目前对地形和敌情都知之甚少，加之游击队势单力薄，疲劳，缺少粮弹，到底如何突围，还拿不定主意。为了不贸然行动，志贞来到一个沟岔里，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她发现这里住有几户人家，便带着几个战士走进亮灯的一孔窑洞里，只见两位老汉正往篮子里装馍馍，两名妇女正在往桶里倒杂面汤。志贞亮明了身分，老汉和妇女们都露出了满面笑容。原来他们看到红军被围，猜想战士们肯定饿坏了，就自动准备饭食，想趁夜幕给红军送去。

后来，红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用绳索攀登，翻过 10 多丈高的无名塬，又一次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3 年冬，大雪覆盖着黄土高原，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红军游击健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为了保存革命种子，上级决定红一分队暂时分散隐蔽。志贞被安排到一个共产党员家里隐蔽起来，谁知这个“党员”已被敌人的残暴吓破了胆，让通缉志贞的悬赏八百大洋迷住了心窍，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任志贞。任志贞落入了敌人的魔掌，被投入瓦窑堡监狱。

敌营长抓住了红军干部，喜不自胜，连忙向上司邀功请赏，并夸海口，立誓言，要在 10 天之内让任志贞开口讲话，一月之内挖尽安定县的共产党。真是好大喜功之徒，自不量力到了可笑的地步！

敌营长开始审讯任志贞，拖着长腔问道：“任志贞，你的政治身分是什么？”志贞镇定从容，挖苦地说：“你们既然不晓得我的政治身分，那凭什么抓我？”

敌营长忙改口道，“你们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是什么？”志贞冷笑一声答道：“这更奇怪了，你们连共产党和红军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为什么要疯狂地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斩尽杀绝呢？”

敌营长接连挨了两棍子，不禁勃然大怒，用力一拍桌子，连声吼叫：“你还不老实交待你的罪行！骑兵排遇难是不是你通的风？刘县长殉国是不是你告的密？刘家沟的刘老爷是不是你打死的？你打死打伤我们那么多兄弟……难道说你的罪过还小吗？！”志贞紧绷的脸松弛了，笑着回答：“坏人被除掉，这是罪有应得。至于我们内部的事，我有义务保密，你无权过问！”敌营长又碰了个软钉子，不知趣地问道：“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和红军，它能给你什么好处？”志贞响亮地回答：“为了消灭你们，解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它能使我和我一样的人站起来，求翻身，争自由，得解放！”敌营长审问半天得不到什么结果，反被志贞弄得焦头烂额，让人耻笑，只得草草收场。

第二次审问，敌人用军棍打，杠子压，竹签钉，打得志贞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几次昏死过去，志贞大义凛然，坚不吐实。敌人只好把她拖进牢房。后来敌人用尽各种办法，让志贞“自首”，但都落得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可耻下场。

任志贞被捕后，党组织曾想方设法尽力营救，但终因敌人防范甚严而未成功。

1933 年农历年除夕那一天，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将任志贞同志杀害。任志贞被害时年仅 19 岁，她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才智和



宝贵的生命。

## 没有麻药用麻绳

1933年2月，粟裕由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升任红11军参谋长。这个军是由方志敏在赣东北苏区创建的红10军同红11军的第31师合编组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这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已接近尾声。3月22日，草台岗战斗刚结束，战场没有清理，部队未及休整，红一方面军即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向北发展、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对敌人实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红11军也同兄弟部队一道，进行了多次作战，都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5月，红军在硝石打了一仗。硝石地处江西省东部，驻军系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的一个师。红军同仇人相见，仗打得格外激烈。红28师攻击敌人的一个山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不下来，肖劲光和粟裕赶到前沿指挥，部队奋力攻击，终于将敌人打垮，并乘胜追击。不料敌人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背后攻击红军。这时，粟裕手上已没有预备队，他立即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头堵截敌人，稳住了阵脚。

粟裕正在指挥部队作战，敌人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臂，殷红的血从动脉血管中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迷过去。幸好身边的警卫员懂得一点急救常识，立即用绑腿把受伤的手臂上部扎牢，才止住了流血。战士们找来担架，冒雨把粟裕送往20来公里外的救护所。山路崎岖，泥泞难行，走了大半天才赶到那里。因为绑带扎得太紧，加上一路下雨，伤口感染，到了第二天粟裕的手臂肿得像腿一样粗。由于伤势严重，粟裕又被送到后方军医院。

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子弹是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两边的骨头都受了伤，神经也打断了，而且感染处出现了皮肉坏死现象。因此医生主张锯掉左臂，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粟裕想锯掉左臂后，独臂在 frontline 指挥作战很不方便，坚持不锯。他对医生说，为了战争，为了胜利，即便有生命危险，也不锯掉。医生被说服了，决定不做断臂手术，但是伤口已经化脓，需要马上手术。那时环境异常艰苦，设备简陋，药品奇缺，医生技术也不高明，动一次手术着实不易。后来，有人问粟裕大将，当时开刀用的什么国家的麻药？粟裕十分幽默地说，哪里有什么进口麻药，中国的麻绳就是麻药。手术时，为了固定受伤部位，不得不用麻绳把手臂绑在凳子上。豆大的汗珠从粟裕额头上滚落下来，他咬紧牙关一声未吭地挺了过来。

手术后，在治疗过程中粟裕吃了很大苦头。当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很差，只得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先放在盐水里浸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放进去一条。这样，不但伤口未长拢，反而长出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医生无奈只好用小耙子，把肉芽扒掉。结果捅来捅去、耙来耙去，过了好几个月伤口总不愈合。粟裕眼见其他伤员一个又一个地重返前线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丢了性命。那天正逢赶集，国民党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立即分散四处隐蔽。粟裕一跑出来即被4个便衣队员紧追不舍，他一气跑了10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粟裕又被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在那里用碘酒治疗伤口，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现在，碘酒在

一般人看来算是极普通的药，可是在战争年代它确实是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它治愈了很多人的伤，挽救了很多人的命。

这次负伤是粟裕第四次为革命流血。1933年11月，粟裕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11军也改编成红七军团，下辖3个师。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第20师师长。刚回到部队，粟裕便投入了浒湾、八角亭战斗，继续为党和人民奋斗和献身。

## 邓小平与《红星报》

1933年上半年，邓小平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接连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后，当了10来天巡视员，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当秘书长。

这时，他不仅政治上受到排斥打击，生活上也遇到不幸，第二个妻子金维映（阿金）在困难时刻离他而去。可是，不论是政治上的沉浮，还是生活中的波折，都没有使邓小平消沉，仍然奋发向上，一如既往。

邓小平当秘书长时间不长，觉得没有多少事做，便要求调动，做点实际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除做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治部主办的报纸《红星报》。

《红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1年12月11日创刊。创刊号上，报头庄重地写着《红星》二字，上方通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红星》，第一期头版头条的“见面话”介绍了该报的宗旨和宣传要点：

它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它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它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作。

它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它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它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它可以答复。

它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它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它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它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它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这份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那时，没有其它的报纸，书刊也很少，没有广播，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成为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主要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政

治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它融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和欢迎。

从1931年12月至1933年5月，是红星报的第一阶段，共出版35期，其中第1至第12期，用铅字排版；第13至第30期散失；第31至35期，为手刻蜡版油印。

从1933年8月至1934年9月，是红星报的第三阶段，期刊顺序号重排，共出版67期，现缺第67期，全部为铅字排版。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在长征途中，又改为手刻蜡版油印。

从1933年8月到1935年1月，这70多期红星报，是由邓小平主持编印的。邓小平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界人士，但对于办报并不陌生。早在10年前，他留学巴黎时，就同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共旅欧组织和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他被誉为油印博士。经过10年的政治风雨，邓小平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凭他的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和理论修养，主编红星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人们到处可以发现邓小平的手迹。虽然多属铅字排版，但常常有邓小平手写的标题，字体秀美有力。

那时编红星报，他手下经常是几个人，有时只有两个人，所以从约稿、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亲自动手。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都出自邓小平之手。

红星报是中央军委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以及领导人的文章和社论。这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不能出现差错，办报人需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要不辞辛劳，一丝不苟。

红星报除了刊载各种消息、战况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趣味问答和谜语等。从这些不大为人关注的小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办报人用心之良苦，作风之细致，他把全付精力都使出来了。

只要看看这份红星报，人们就会明白，像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人，的确是忘我的人，把个人的荣辱利害置于身外的人。他能够在重要的岗位上指挥千军万马，取得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默默无闻，像蚕吐丝蜂酿蜜那样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做出出色的成就。

## 红军首次纪念“八一”建军节

中国工农红军是革命的队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它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我党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毅然组织国民革命军中的进步力量和工农群众中的进步力量，举行起义，逐步建立起来的正规红军。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时间的推移，确定一个建军的时间，每年或几年在这个节日举行必要的庆祝活动，作为红军的节日，以怀念历史，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鼓舞士气都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各地各部起义的时间、规模、所起的作用不一样，以哪一天定为建军节适当呢？

红军总政治部在王稼祥主任领导下，经过比较和研究，认为南昌起义规模大、兵力多、影响深远，建议将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纪念

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总政治部的建议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报告，即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颁布命令，指出：“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这年的8月1日，在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由于当时敌人百万大军已展开向根据地进攻，各主力军团都在前方作战，参加这次阅兵的只有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的学员，地方政府和一部分单位也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为了纪念这一节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还举行了运动大会，以纪念建军节。运动会于8月6日开始，项目分为三大类。

军事类项目主要有：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步兵武器实弹射击，投掷手榴弹，刺杀，军事知识测验等。

政治文化方面有：政治常识测验（口测），墙报，消灭文盲运动，唱歌，演新剧等。

体育运动方面有：100米、500米赛跑，通过障碍，跳远，跳高（徒手和撑杆），低栏，台球，足球，篮球等。

晚上还在月光和汽灯下举行了游艺晚会。

运动会充满了“军营”气息，开得生动而热烈。

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号召部队开展练兵运动，迎接“八一”建军纪念日。8月1日，方面军总部在四川巴中市举行了隆重的检阅大会，川陕根据地各个地方也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指战员们与川陕根据地人民一起，以高昂的斗志和百倍的胜利信心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从此以后，“八一”节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每年都要举行庆祝活动。

## 我军颁发的军功章

军功章，是对参加军队的成员，在作战中创造的光辉业绩褒奖的标志。它可以激励士气，增强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红军初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仍然很重视这项工作。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对参加南昌起义、创建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立下战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一枚，这是我党、我军最早颁发的军功章。

为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对出席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颁发纪念章各一枚。备战略区，如华北军区等也先后颁发解放纪念章和军功章。

1951年在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郭沫若、陈叔通、彭真等致函毛泽东主席，建议在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周年的时候，制作抗美援朝纪念章，发给参加志愿军的指战员，毛泽东同意后，由抗美援朝总会制发。

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分别颁发“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每种勋章分为1—3级。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对作战和部队工作中成绩卓著者，颁发军功章，区分为一、二、三等功的军功章。对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称号的颁发一级英模

奖章，对大军区一级授予称号的颁发二级英模奖章。

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决定，对出席全军英模大会的代表颁发荣誉证章。

1988年，中央军委决定，分别授予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解放功勋荣誉章。

## 叶飞化装脱险

1933年冬，叶飞作为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到闽东的巡视员，在福安县境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连打数枪，生命垂危，濒临死亡。后来，他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救治和掩护下，化装安全脱险。当时敌人击中叶飞的子弹，有的至今还残存体内，成为战争留下的永恒纪念。

福安县的狮子头，距县城60多里，是个渡口，扼寨歧到福安的交通要道。渡口有家叫狮子头的客店，过往行人大多在这里吃饭、休息，然后再登船或上路。这里人来客往，便于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也常在此处接头。它实际上是闽东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

有一天，叶飞约一个同志中午在这个客店接头。叶飞早晨从山上游击根据地下来，按时到了狮子头客店，先在楼下坐一会，接头的同志还未到，店主人便把他带到楼上吃饭。楼上是他们约定接头的地点，只有叶飞一个人。叶飞正在吃饭，听到有人上楼，以为接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看，不对，上来的3个人全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还未等叶飞掏枪，叶飞已被敌人按住，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敌人搜去叶飞的枪和笔记本，就跑下楼去。这时，叶飞脑子还清醒，听到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还有一个人留在楼梯口正看叶飞死了没有。那个人见叶飞抬头，就大叫道：“还没有死！还没有死！”接着又朝叶飞开了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上臂上。叶飞虽然两次被击中三枪，竟然没有死。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咬紧牙关躺在那里纹丝不动。紧接着，又听到楼下哨子响，有人喊着“快走，快走！”以及跑下楼的声音和楼下的人纷纷跑出去的嘈杂声，但他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好久，周围万籁俱寂，叶飞才抬头观望，确实没有人了。他的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叶飞经过艰难地爬行，爬下楼梯，爬出客店，爬到水沟边，终于不省人事。

等叶飞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床上，而且还有人守护照料。这时已是半夜12点了。原来，是狮子头村的共产党组织，到下午4点多钟，派人前往狮子头客店察看情况时，发现叶飞昏死在水沟边，组织人把他抬进村，并请镇上的医生治伤。当时，叶飞身上的棉衣、毛衣、衬衣全被凝结的血粘住了，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一层层地剪开，费了很大劲才把伤口洗净。由于条件限制，射进头部、胸部的子弹无法取出，只能上好药，包扎起来。

刺杀叶飞的人是福安县国民党派出的特务队。由于此处接近游击根据地，狮子头一带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所以特务行刺后不敢久留，匆匆返回福安县城。特务头头一看搜来的笔记本，知道叶飞的名字，立刻又派行刺的特务赶到狮子头客店，要砍掉叶飞的头，好向上级邀功请赏。当特务返回客店时，叶飞早被群众救走了。他们四处搜查，根本找不到叶飞的踪影。第二

天，敌人派部队封锁了狮子头方圆十里内几个村子的路口，到处搜寻，花了一个星期，结果一无所获。慢慢地，敌人放松了，撤掉了检查哨。为了安全和养伤方便起见，党组织决定把叶飞送到山上游击根据地去。

那时斗争复杂，从村里到山上还有一段路程，一路上也不安全，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同志们煞费苦心，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那时福安农村的妇女还裹小脚，富裕一点家的妇女回娘家要坐轿。于是，同志们把叶飞男扮女装，打扮成回娘家的妇女，坐在轿子里，帘子一放，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叶飞当时才19岁，穿上妇女的衣服挺合体，就是穿不了绣花鞋，只能伸进两个脚趾，头上的伤口处用头巾包上，仅露出两只眼睛。叶飞上轿后，群众还在他膝盖上放上一床棉被，只露出一脚尖。为了不漏一点破绽，还按当地回娘家的风俗，让一个小孩随着轿子，一同上路。一切准备妥当，轿子启程了。抬轿子的是两名共产党员，非常负责，一直把叶飞抬到山上。叶飞终于安全脱离险境。

山上的同志看到叶飞伤成这个样子，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县委又把镇上那位医生请来给叶飞动手术，取出了留在头部的那颗子弹。这颗子弹从叶的头部左侧耳前射入，碰到骨头，往下偏去，从面部中间穿过，留在右脸侧的皮下，如果子弹往上偏去，就会穿入脑部，便会脑浆迸流，人就没了命了。胸部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只好让它长久地留在叶飞体内了。

叶飞在山上治疗一个多月，伤痊愈后，又投入了新的更加艰苦的战斗。

### 怒杀说客

1933年，红3军退出洪湖之后，绕道豫西、陕东，经过7000余里的长途跋涉回到了湘鄂边。这时党、团组织被解散，政治机关被取消，全军由1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情况危机。历来坚持党的领导，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多次要求恢复党、团组织，建立根据地，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阻挠未能实现，一时间红3军艰难地转战在湘鄂川黔边界。

1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调集重兵对我红3军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派反动政客熊贡卿以高官厚禄为“钓饵”，前去游说收买贺龙。熊贡卿受领任务后，先是没敢直接去见贺龙，而以昔年友好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试图探探贺龙的态度，信中说 he 很长时间没有与贺龙见面了，想前来叙叙旧，并表示看在昔日友好的份上愿意帮贺龙解脱面临的重兵围逼之困境。贺龙一下子就识破了熊贡卿的险恶用心，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当时，蒋介石对中央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搞到敌人的一些情报，分局即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来。让贺龙会见他。熊贡卿这个不识事务的反动政客得到回音后，认为贺龙有所动心，很快就来了。然而，他根本没有料到，当贺龙把情况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立即下令将其逮捕了起来。经报中央分局同意，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路旁枪毙了这个反动说客。在处决熊贡卿的审判大会上，贺龙面对全军指战员，激情地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

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听了这些充满凛然正气的话语，望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贺龙，熊贡卿浑身瑟瑟发抖。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这个反动政客的生命。

次年的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还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可笑的是过了不久，蒋介石还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说：“熊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真可谓是恬不知耻了。

